

炎黄春秋

田纪云：怀念小平同志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

于右任的乡愁

李世民与“贞观之治”

第8期

2004年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怀念小平同志

● 田纪云

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个年头了,我们每想起这位伟大人物就肃然起敬,无限怀念。

我是1981年初调国务院工作的。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国务院我长期分管经济工作和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的工作,经常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与小平同志接触较多。每次接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初次接触小平同志

我初次个别接触小平同志是1984年春。3月13日,四川省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孟薇打电话给我,要我约小平同志和曾在四川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到北京的四川饭店聚一聚,品尝一下川味,我同意为他约请。我首先与小平同志办公室王瑞林打电话,他请示小平同志后表示同意,我又约请其他人。这些人有:王震、杨尚昆、段君毅、陈野苹、宋时轮、李一氓、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罗青长,还有当时的商业部长刘毅、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人,惟万里我忽略了邀请。四川饭店坐落在北京西城线胡同的一个三进四合院内,环境十分幽静。3月15日上午十一时许,大家都先后来到饭店客厅,十一时三刻,小平同志在邓楠和毛毛的搀扶下来到饭店,大家争相与他握手、问好,饭前许多人与他照相,进餐中也有不少人站在他的座椅后与他合影。他很随和,那么多人与他合影没有一点厌烦之意,但当他端起酒杯与大家干杯时,突然发问,怎么万里没有来?我马上回答:呀,是我忘了通知他。他诙谐地说:吃川菜不能没有万里。后来我才知道小平同志与万里

有至交,关系非同一般。

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若干指示

1985年至1987年是我与邓小平接触最多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在国务院协助万里主持日常工作,同时我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每年总有几次陪同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请示工作,以下是我亲自听到的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问题的若干指示。(这些指示,主要是根据我当时的记录,与经整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有关讲话,在文字上不完全相同,有的《文选》中没有。)

我第一次去小平同志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小平同志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讲(我是物价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对于价格改革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认为早晚要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迟过还不如早过。他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又说:“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在价格问题谈完之后,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谈到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问题(1984年2月小平同志曾到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进行视察)。他说,当初试办经济特区就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没有争论,下决心干,不干,就闯不出路来嘛!现在看,这个决心下对了。四个特区办得好,为今后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如果说有不足,是没有把海南岛也列入特区。大家一致点头称对。这也是1986年国务院主要领导率领有关部门去海南进行考察,以及后来海南升格为省、



邓小平与叶剑英在一起

并成为特区的最初动因。

1985年下半年出现了物价上涨过高的情况,人们对调整工资也有不少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由我给大家讲一讲经济形势问题。机关干部大会是1月6日召开的,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差不多都参加了,由我作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胡耀邦也讲了话。随后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他说,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讲得好,可作为中央二号文件发到全党(一号文件是农业问题)。

1986年6月10日,我与国务院主要领导又向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形势,当时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农业滑坡的局面未见大的好转。我们进门尚未坐定,小平同志就说,农业问题可要注意啊!农业一旦滑坡,三五年转不过来。

小平同志在听完汇报之后说,当前经济情况总的还是不错的,是不是有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

不过来。又说,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要避免过几年又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二是外汇问题。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要打开出口市场,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他指出,逐步减少外贸逆差是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小平同志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要精简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就搞不活,企业也就没有积极性。

小平同志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战略性的,十分重要。国务院根据小平的指示,很快采取了加强农业,加强外贸工作的措施,并经书记处研究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时,姚依林、我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向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坐下,小平同志就说:改革要过几关?我讲了“过五关斩六将”,但究竟要走几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后还要走几步,花多少时间?

国务院领导回答: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汇报了八六年经济形势,在讲到外债时,小平插话说:外债不怕,但要用于生产,用到补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着,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下一步改革的设想。改革的问题,重点讲了调整钢材价格、原材料价格、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金融改革等问题。在讲到提高粮食价格,同时提高职工工资时,小平说:“学校伙食要解决一点,300万人,加点钱,解决一点,伙食改善一下。”

关于1987年工作,小平同志强调说:明年工

作重点是两条,一是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二是搞活企业,从长远看搞活大中型企业更重要。

在讲到金融改革时,小平同志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在讲到要把大中型企业经营权交给企业家时,小平同志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问题,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就好为谁服务。

在讲到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时,小平同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问题。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港口、铁路、通讯、原材料等,这些都涉及到发展后劲的问题。

在讲到要利用外资时,小平同志说:墨西哥过去借了多少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债4000元,墨西哥人均2000元,由落后国家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他们用外资多了。我们要学习他们勇于借外资的胆略,但要适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认为他欠债多就是失败的。

最后,小平同志说:关键问题还是粮食、外汇这两个问题,不要忽视。再花大量外汇买粮食不

行。另外,电子工业太分散了,为什么不与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对于企业下放,小平同志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的阻力来自婆婆太多,听说经委有上万人,必须精简,计委一定要小。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还有一定知识,到基层去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办公期间,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与南韩关系问题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与南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随之,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韩经济协调小组,由我任组长,在与南韩未正式建交之前,许多经济交往,都是由这个小组首先研究提出意见报中央、国务院决定的,这对后来中韩正式建交,确实起了促进作用。

1987年11月初,我陪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向小平同志汇报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共中央领导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首先提出的,汇报时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讲,讲得非常详尽生动,主导思想是在沿海两亿人口的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让这个地区的近两亿人口吃国际



前排从右往左:刘毅、段君毅、田纪云、杨尚昆、王震、邓小平、陈野苹、宋时轮、李一氓、李伯钊、罗青长(1984年3月15日于四川饭店)

饭。还讲了沿海的有利不利条件以及需要在政策上解决的问题等。小平同志听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布署。3月4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布署。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养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根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经国务院批准,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

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小平同志支持洋浦承包开发

1987年6月1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们正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植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根据国务院的提案,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海南省,并决定海南省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1988年下半年,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承包开发洋浦32平方公里面积的开发区,并由“熊谷组”负责招商,引进项目,把洋浦这个一片荒凉的海岛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海南自由工业贸易区。为了考察这一方案的可行性,我于1989年1月17日至20日率国家计委、经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海关总署、特区办公室等部门的负责人去海南考察论证。考察结果,从总体上认为是可行的,如能

成功,将成为海南经济特区建设的牛鼻子。我与参加考察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当时筹建海南省的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详细磋商后,达成了以下共识:

(一)、海南整个岛是经济特区,这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但要一下子全面开发、全面铺开建设,既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不具备条件。海南开发只能像吃饭一样,一口一口地吃,像走路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全面铺开是不现实的。选准突破口,一片一片开发是比较现实的。当然说重点突破,并不是说面上就地踏步,面上要逐步完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要把农业和水利搞好,稳步发展。

(二)、海南选择洋浦作为重点开发地区是可行的。洋浦作为成片开发的起步点是比较理想的,条件比较好。一是傍海,有建设港口的条件;二是已经和正在建设深水港口,比平地起家好得多;三是地貌平整,不要愚公移山,又是一个半岛,比较容易管理;四是那里的地层是岩石,将来打基础方便,也可就地取材;五是移民少,搞成片开发选择一个没有移民的地点不容易。此外,还有易于防治环境污染,等等。

(三)、由于先生承包开发洋浦,是个理想的承包人。于先生有远见,有魄力,是精明的企业家,在海外与一些大财团有广泛联系,而且对各方面都熟悉,是一位很好的承包者。希望于先生能做到“三不依靠”:资金不依靠中国;能源(煤、电、气、油)和原材料不依靠中国;产品销售市场不依靠中国,至于中国需要购买开发区企业的产品,则作为进出口贸易对待。

(四)、有五个问题希望海南的同志和于先生充分注意到。于先生那里对投资开发洋浦提出了一些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有些问题要考虑得细致些、明确些,然后达成协议。“先小人后君子”,协议必须做到“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样,以后的事办起来就顺当了。

1、涉外问题。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要遵守我国的法律和对外政策。

2、司法、公安的管理问题,要服从中国的法律。搞好治安,也为了保证开发区的安全。

3、海关和税收问题,总的要执行我们经济特区对外资企业的法规。其他如有特殊要求的,要

另议。金融问题也要专题研究。

4、环境保护要服从我国环保法律。

5、地下资源问题。如果这个地区发现地下有矿藏,则要另议。地下水开发利用到什么程度,也应事先言明。

这些问题,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要考虑得周到些,说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者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从开发、建设、生产、经营上,你说了算,企业说了算。这样,就能建立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也保障了自主经营权。

洋浦利用外资成片开发的总体方案要抓紧报国务院审批,由中央、国务院决策。

不料在我率组去海南考察的同时,全国政协也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去海南进行考察,我们前边走,他们后边到,我们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也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并向中央、国务院正式写了报告。由于意见完全相反,我随后向国务院写的报告如石沉大海。就这样洋浦开发被搁置起来,而咒骂丧权辱国之声不绝于耳。

1989年4月28日,小平同志在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内外不同意见者说清楚。”不久“六·四”风波发生,洋浦开发也就搁置起来。直至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春风的推动之下,海南省终与“熊谷组”达成了承包开发协议,条件还是那些,一点没变。但时间耽误了四年,黄金时代的投资机遇已经过去,所以至今洋浦开发也不见生机。真是好事多磨,实在可惜呀!

从我与小平同志的直接接触中,我认为小平同志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的



田纪云参观农民盆景展

战略家和实践家,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一切着眼于实际效果,所谓“黑猫白猫”论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学观点。他思想敏锐、高屋见瓴、胆识过人,雷厉风行、势如破竹,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我看是符合实际的。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20世纪是最不幸的世纪,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中无数次的局部热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但正是这个不幸的世纪造就了无数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头地的领袖人物。他又说:“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则必须建立新体制。”

在我看来,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旧世界的摧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优秀的建设者,是他勇敢地领导中国人民同传统观念与实践决裂,拯救中国于危难之时,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肯定和支持了由胡耀邦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他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们向他们学习的观点。在这个报告中,对党的干部路线,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都作了明确阐述。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

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成功,是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的会议。全会确定了要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全会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等。全会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会肯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批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全会还对党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那些在文革中搞打砸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人很快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大批挨批、挨斗、靠边站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其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大得党心,大顺民心,它像一股

强劲的春风迅速吹拂神州大地,使万物复苏,鲜花盛开。

在农村,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迅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在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逐步展开;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之对财政管理体制、计划体制、商业外贸体制、物价体制、劳动管理体制、工资制度等相继进行了初步改革。

1979年,根据小平同志的提议,开始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同时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1984年2月,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肯定了建立特区的正确决策。视察期间,他高兴地为三个经济特区都题了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

1985年1月,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沿海经济。1987年下半年,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将沿海11个省市、2亿人口、32万平方公里和国际接轨,吃国际饭。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

南方谈话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鼓舞推动下,从1979年到1988年的十年,称得上是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国力大增强,人民生活大改善的年代,饱经风霜的中国人民开始焕发着自己的青春。但不幸的是,正在中国人民意气风发、阔步前

进的时候,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风波”,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度蒙上了阴影。

一些思想极其僵化的同志,企图利用“风波”带来的机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

当时“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

大好形势,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包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

在那冷风吹袭的日子里,广大干部、群众都



田纪云深入基层考察

憋了一口气,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邓小平冷眼观察了三年,眼看他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可能毁于一旦,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下决心去南方视察,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谈话。他大声疾呼:“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又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人心就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因此,它犹如一声春雷,使沉寂的神州大地再次复苏,全国人民为之欢呼。把那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人,吓得魂销魄散。正是这个谈话,为中国的发展再次拨正了航向,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中国继续沿着党的十三大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胜利前进!

邓小平拯救了改革开放,也再次拯救了中国!

小平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 关山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

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你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领导《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同志,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非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



邓小平在任仲夷陪同下接见群众（1982年2月于广州）

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同志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份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

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我记得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还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

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特区指的是广东、福建两个省”

关：你来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接见了你吧，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不单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

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

“变通”

关：你是怎样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的？

任：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非常求实非常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总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我多次讲过，“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

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总精神和总原则不能改变。

就是说，“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

“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关：你到广东后，最早是哪一年见到小平同志，他对你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

任：我到广东不久（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

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关：计划经济真的管得那么严？

任：我给你讲个例子吧。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不可能管好。

坚持先行一步，加快发展

关：你主政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你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在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我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十二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我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十二字”方针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我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作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在那几

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实现了小平同志和中央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

“二进宫”

关：你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过失误吗？小平同志批评过吗？

任：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的问题是有所警惕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80年，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19）81年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遏制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浪潮。但是由于省委



任仲夷（1984年）



任仲夷视察深圳特区建设工地（1981年）

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时，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其中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一份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

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又有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同

志说：省委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工作切实做好。但有个别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我对胡耀邦同志说：“这次会议，没有

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八时许,耀邦、紫阳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紫阳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有的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我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关:你检查了什么?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

任: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我和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

关: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

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紫阳也帮不了我。

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登载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有的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我还听习仲勋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

“三个坚定不移”

关:你对(19)82年两省座谈会精神是怎样传达的?

任: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过去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大讨论,其实是只有大批判,哪里有什么大辩论,只有“批倒”,“批臭”,不允许你还口。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省委在广州



任仲夷(右)与本文作者

珠海宾馆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两省座谈会精神。会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

因为有胡耀邦的尚方宝剑,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我就没有传达。

我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我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根据中央的精神,在这次会议上,我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不久之后,我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和前“两个坚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对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十六字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改为二十四个字,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关:“排污不排外”也是在这次会议提出的?

任:“排污不排外”是在这期间提出的(19)82年5月,我接受《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解释得比较具体:我们不排除,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我离休之后,对“排污不排外”的问题,曾

在报纸上谈过,污有“内污”、“外污”之分,“排污”主要应当重视排“内污”。

关:事实上,世界上找不到纯粹好的和绝对坏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有有利有弊的,所以对外开放带来一些污染毫不奇怪,甚至可以说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东西变成主流就行了。而且有些我们认为是“污”的东西还不一定是“污”,比如过去就说“市场经济”、人权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等等。

任: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所以要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不是说了吗,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现在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价值观今天都宜和谐相处,彼此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共同发展。

广东多亏了邓小平

关:我接触过一些老同志,有的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

任: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定

的,连特区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从办特区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时刻关注广东,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到过最多的地方就是广东,小平同志那些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

胡耀邦、赵紫阳也功不可没,提广东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广东改革开放的早期工作,还要提习仲勋、杨尚昆等负责同志,他们开了好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是1980年才来的,在广东工作的时间只有四年多,贡献是不多的。(1985年我就离休了。以后的每一届省委都干得很好,都使广东的经济和各方面的工作有新的跃进。

邓小平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

关:以你的亲身经历,小平同志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任: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自从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的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还能背诵出来。不像我党历史上有的领导人,总是讲空话、官话、重复来重复去的话,讲了一大堆,人们还是不知

所云,甚至连自己还未弄懂的问题,却夸夸其谈地教训别人。

关:小平同志给人们的印象是比较严肃的,很少见他开怀大笑过。据你所知,他有没有活泼的一面?

任:有。有一次我跟他闲聊,谈艺术问题。我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很八股,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长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关:你是怎样评价他的一生?

任:总的来讲,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看他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人无完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自己就说能对半开就不错了。显然这是他谦虚的表现,但不能说他没有过。历史会给他客观的评价。

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

最好的纪念就是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

关: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这位伟人?

任: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

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没及时跟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人们说

这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是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最近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结果触目惊心,但这还是冰山一角。小平同志自己曾说:“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是真理!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有很多精辟、全面、系统、科学的论述,这主要集中在《邓小平选集》第二卷。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理论是正确的、精辟的,他的政治改革理论同样也是正确的、精辟的。改革之初,小平对政治改革雄心勃勃,多次强调,多次讲。事实上,思想解放运动和初步的政治改革也确实为经济改革扫除了障碍,但后来他可能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得多。是留下一个社会相对富强安定但问题丛生的社会,还是留下一个可能动乱的社会呢?他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可能不是完全自觉的,也许是无奈的。所以,1992年南巡,他对政治改革就说得很少了。在他的南巡谈话中,几乎没有提到政治改革,但他也没有收回和改变他对政治改革的思想 and 观点。他在南巡讲话中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认为,他所说的改革,绝不只限于经济改革。他留下了一块还未被真正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当然,这也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以人为本,强调要依法治国。这很好很重要。这是非常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什么叫协调发展?我的理解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更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能很好完成的历

史任务。

政治改革需要勇气“杀出一条血路来”

关: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虽然像你说的那样,政治改革是大有作为的处女地,但毕竟是“地雷阵”,谁愿意冒这个风险?

任:这一关最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

我总感到现在的闯劲还不够。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南巡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

政治改革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怕乱,其实政治改革不会大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现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谁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败。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只要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因为这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

政治改革可以先搞试验

关:在中国,政治改革勇气是需要的,但也要讲策略,这方面你有什么高见?

任:再过两三个月我就91岁了,老啦,谈不出什么高见,浅见倒有。

毛主席曾提出的种“试验田”、“一切经过试验”的办法我看可以用。不仅要搞经济特区,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区。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

得经验,然后推广。

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地级市甚至一个省,例如海南省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我认为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件事又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我们稳步前进(先做试验就是为了稳嘛),是出不了大乱子的。

关:广东是先走一步的地方,政治改革能不能也先走一步?

任:我看可以。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讲过了。改革开放后,中央、国务院就明文把广东、福建定为“综合试验省”,深圳定为经济特区,赋予先走一步的任务。这个文件直到现在并未收回和撤销。江泽民也曾希望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怎样增创新优势?增创什么新优势?我看关键还是要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关: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你有什么看法?

任:我看这是进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可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开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的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如果我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就谈不上法治。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

关: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任: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用“十六大”江泽民同志报告的提法就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

是强调其阶级性,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还要强调一点,必须把管理众人之事,看成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败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就的。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关:可是我们干什么都强调“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人权、连市场经济也要搞中国特色的,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任:中国的东西自然会打上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烙印,不用强调都会这样。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中国特色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如果是落后的,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少越好。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特色往往带有封建专制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色彩。这次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很说明问题。我看就是上面讲的中国特色在作怪。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不对的。

关:说到西方的政治文明,我感到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就是透明和公开。我今年初去了一趟北欧考察,感触良多。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的一切开支、每一笔经费的去向和每个公务员的收入财产都是公开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你不但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找到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室成员)的财产和收入资料,而且可以找到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有一位高官只不过公务宴请时上了一道鹅肝,就被传媒批评超标而丢了官。如果中国也这样做,想腐败都难。

任:这种办法好,简单易学,不难办到。现在电脑已经很普及,每个单位都有,上网就是了。这又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利党利国利民,说不准每年还可以省下1000多亿的公款吃喝费。

关:任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任: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关,但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责任编辑 杜导正)

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

黄万里,这个绝大多数国人颇为陌生的名字注定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他以及他那交织着梦想与迷茫的悲剧人生也注定会引起越来越深刻的反思。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黄万里,那就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立志以学问报国的清华大学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戴上右派帽子备受歧视的水利和水文学专家、有胆有识无私无畏的知识分子、三年前以90高龄满怀遗憾和困惑辞世。

翻阅表现他传奇人生的有关资料,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凸现在人们面前:蜚声海外而在国内少为人知。1987年应邀到美国12所大学巡回演讲他在水力学、水文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母校依利诺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通过国际咨询机构征求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并复函表示钦佩,而他关于黄河、长江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声音连同他本人长期被湮没;1999年底,美国名人传记宣布他为20世纪世界杰出人物,而表现他智慧和探索精神、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却迟迟未能正式出版,伴随他终生痛苦的是他的知识的价值无法实现,他的备受折磨的心灵一直没有轻松过。我绝对相信,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直言贾祸,他的艰难坚持,他的无可奈何,勾勒出某种悲剧色彩的一生素描,他的个人际遇所表现出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所引出的关于政治和科学的话题都将被今人乃至后人一再提起,当代中国史乃至世界科学史将会记载黄万里这个闪光的名字,他理当享有一个正直的爱国的科学家应有的殊荣。

面对水灾:年轻的桥梁工程师下定改学水利、治理黄河的决心

1911年8月,黄万里出生于上海,三个月后,带有改朝换代性质的辛亥革命爆发,快速的社会变革几乎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辛亥革命前后,黄炎培参与了为时甚短的政治活动,可是官场的混浊气氛让他深感窒息和压抑,此后就把学以致用职业教育的理想,锁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借此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这种转向对黄万里的影响是直接的。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入唐山交通大学学桥梁建造,1932年毕业,并发表《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等三篇论文,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并出版,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桥梁工程师。1931年长江洪水,仅湖北云梦县就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洪水决口十几处,人财物损失无算,给沿黄地区造成巨大灾难。黄万里因此立志探寻治理黄河之道而改学水利。他回忆说:“黄河水患最难治,我改学水利就为了治黄河。我的决心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的朋友、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告诉我: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

●
许水涛

专业出身,没有人懂水文学。许先生建议我从水文学学起。”与鲁迅的弃医从文、外敌入侵时许多热血青年的投笔从戎一样,黄万里人生选择的转变表现出拯民于苦难的博大胸怀和高远的思想境界,这一质朴的行动本身胜过万千豪言壮语。

1934年元旦,黄万里赴美留学,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奥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学习期间,黄万里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成为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其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被认为是水利学术界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在美期间,黄万里驱车45000英里,踏遍当年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工地。通过学习和参观,他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

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洪水治理问题。1937年初,黄万里学成归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亲邀其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以年轻为由谢绝。理由是,自己考取的是官费留学,花了老百姓的钱,现在最切要的是亲身参与中国的水利事业,不能欠黎民百姓的钱。他想考察中国的河川,并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1938年至1943年,他和部下先后六次长途考察,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其间训练了40多名工程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万里回到南京任水利部

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因为战乱,立志治黄的黄万里在回国整整十年之后才来到他魂牵梦绕的黄河岸边,可以直接考察黄河的水文和泥沙,可以化解长期悬在脑中关于黄河的一个个谜团,其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以一个专家的眼光观察和分析着那恼人的水土流失,发现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而是一块块在剥落。对于无雨时节黄河水依然浑浊的现象,他也得出了合乎实际的解释: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他到达兰州后,广聘各方人才,迅速组建了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队,由他拟定的该省水利事业的方针为: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

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学》、《地下水工程》等。他治水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就是要弄清河流的特性、流域的地质地理状况,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开发水利,为我服务。

1949年4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6月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在上海受到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他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因全国高校院



1935年,黄万里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系调整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直至2001年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作。

面对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工程方案:众人之诺诺压制了一士之谔谔

然而,黄万里在清华园平静的教学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因三门峡工程的争执而中断。

孕育了中华文明、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几千年来水患频仍,为历代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所以在天下初定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就将整治黄河、让黄河安澜的愿望和决心付诸行动。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于同年底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这个报告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同时实现发电和挡沙的目标。苏联境内很少泥沙量大的河流,他们的专家缺少泥沙河流治理经验,所以他们的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结果,这一与黄河实际相背离的思路却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1955年,水利部召集专家学者讨论这一计划。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4月,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350米规划中的60万移民。此时,学识渊

博、治学严谨的黄万里郑重地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要点为:

1. 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即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 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可叹的是,这种呼声被漠视了。作为最早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灾难性后果的黄万里,焦虑和怅然失落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一年后,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他通过小说《花丛小语》把这种情绪直白地发泄了出来。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甄无忌就破口大骂:“照你说,这是工程设

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甄无忌接着就乘兴发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府的特点。”

于是田方生也激动了，就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

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黄万里的厄运从此开始。

就在《花丛小语》在清华园闹得沸沸扬扬的

时候，1957年6月10日-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给两个月前正式开工的三门峡工程出主意，想办法。准确地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外，大部分人不说话，其余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这时，黄万里站了出来，他不肯迷信苏联权威，大胆进谏，不惜引火烧身，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辩了7天。他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坝修不得。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立即有人反驳他，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换了一种口气：“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

最后这一条与会者全都同意了，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主持施工的“水利专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6个施工泄水洞全部堵死。

在不能宽容不同意见的年代，黄万里独自发出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声音，其结果是永远失去对于水利工程的话语权。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成为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发表《花丛小语》更是授人以柄。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转载了《花丛小语》，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毛泽东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归入另类。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简直是空谷足音：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9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认为黄万里的治黄主张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质问黄万里“骨

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黄万里在46岁的壮年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指斥彭德怀时，说他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的直言在最高领袖的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何等之深！

竣工后的三门峡工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同年9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自然规律是无情的，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一开始便被一一验证，设计上的缺陷也一一暴露出来，三门峡开始“付学费”。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就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移民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而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迅速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一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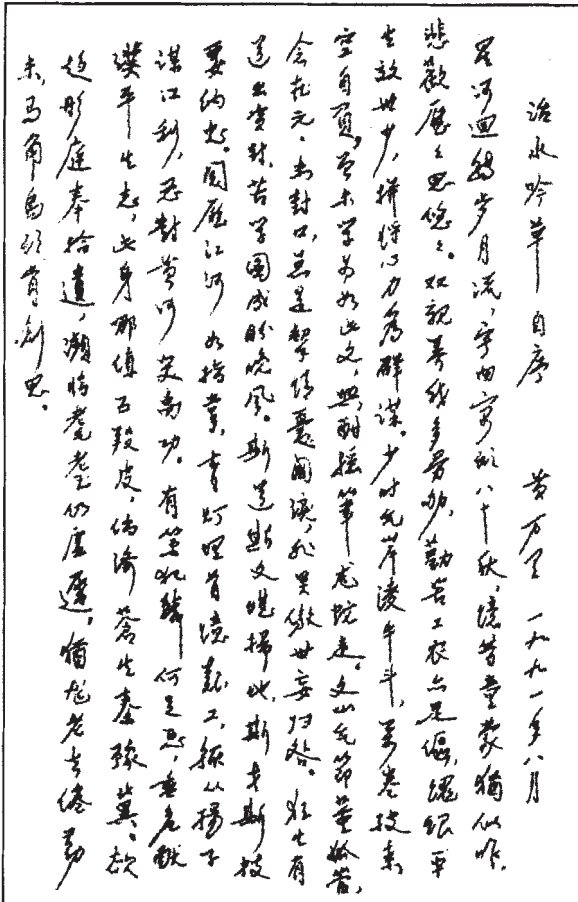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

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名副其实的“悬河”。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而把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丧失了用武之地，只好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漂”。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门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事实正朝着黄万里所担忧的方向一步步地发展着。

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容忍下去，在1962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

代表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面对实际情况，国务院让水利部研究三门峡大坝改建问题。

1964年，周总理在两次讲话中谈到三门峡工程。一次是在6月10日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



黄万里手迹

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另一次是在12月18日治黄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他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并立即决定了第一期改建方案：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个“两洞四管”方案被认为是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但他也指出，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作为一个救急方案，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显然还不够。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

1968年，第一期改建刚刚结束，第二次改建就于1969年接踵而至，所有的争论至此已经变得毫无意义，“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以备将来排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1000万元，又将1~5号机组进水口高程由300米降到287米，泄洪排沙。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

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与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以坝身百孔千疮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代价，暂时解决了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按照一些水利专家的看法，原指望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近年来，有专家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河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净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河床高程1996年达328.6m，比建库前抬高5.2m，潼关河床的过水断面现在只有建库前的1/3左右。因此建议进一步改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增大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解决潼关以上库区继续淤积和洪涝灾害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29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十几次迁移，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三门峡工程直接的经济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整个三门峡造成的损失有人估算不下百亿元。

2000年4月，在渭南召开的陕西省三门峡

库区防洪暨治理学术研讨会上,81名专家学者针对库区出现的恶化态势,一致认为洪灾威胁非常严峻,解决三门峡库区问题是关乎陕西关中东部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2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2002年9月6日,水利部长汪恕诚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听取中国工程院“降低潼关高程可行性研究”项目组的汇报。汪最后表示:是否通过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运用进行降低潼关高程,需要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水利部要安排一组课题研究,以加强政府推动。

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三门峡工程以充满浪漫主义的构思开端,致祸国殃民的恶果为终结。

空悲切的黄万里

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能体会到黄万里备受煎熬的心情。头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他只能空怀绝技而无处施展,他只能在孤独中长吁短叹。常言道:愤怒出诗人,更何况是古典诗词造诣深厚的黄万里呢!此后,他常常把无可名状的怅然若失和痛彻心腑的凄然情绪化为一篇篇语意婉切、意境高远的诗作,这里有他潜孕于思想深处的社会良知,这里有他高悬真理的执着信念,这里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士大夫情怀,有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1962年8月,“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途次为七言长句。”黄万里写了《念黄河》。诗中叹曰: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鬢。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1963年,潼关河床继续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8月,“癸卯

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时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黄万里又写了《哀黄河》。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土?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湫?
可怜血汗付东流,留得空库仰谷底。
五载尔来管葛多,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泄。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问,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1964年春天,黄万里实在坐不住了,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陈明三门峡坝淤积的严重性。

不久,水利部召见黄万里,要他拟出三门峡大坝的改建计划。黄万里昼夜兼程,以60天的时间完成《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真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黄万里难得有一吐为快的愉悦。但事与愿违,黄万里的建议未得采纳,他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之中。

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被指为特务而归于改造的“异己分子”的黄万里,却仍然“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他曾就三门峡改建方案致信周恩来总理,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1973年初,被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的“从下游移来的苦难”,悲从中来。他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完成了《论治

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质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自认为,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获。

1976年,黄万里的一颗牙齿脱落,那种离体感觉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多少让他伤感,他竟将这样的一件小事与治河联系在一起,治河在他心中沉甸甸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牙落惊老·调寄渔家傲》:

牙落始惊身已老,形衰不役心犹矫。

欲治黄河赍志早,空负抱,制鳌有策知音渺。

王景千年擅工巧,长才自古能伸少。

细考其谋何所造?行注道,分流回注淤沙皎。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黄万里右派终于被改正。1979年,他被容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做讲解。此时,虽不再受责问受批判了,但并未得到重视。其后,黄万里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治理江河的策略以及中国水资源利用的问题,在科学上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写出或发表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华北平原的整体开发》、《我看“黄河治理开发纲要”》、《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等文章。到90年代,他不仅完成了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多篇论述,而且对长江三峡卵石输移量和三峡高坝的可行性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并向国家决策部门反映意见,表现出一个老科学家崇高的敬业精神。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在清华园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7天后辞世。两年后,也是在8月下旬,发生在渭河流域的洪灾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他在40多年前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近几年来许多专家担忧的现象终于出现。大自然的报复来得如此迅速和无情。黄万里未能亲睹这场洪灾,对他来说也算幸事——平生关注民瘼却受尽人世烦扰的元老,至少免除了一次痛苦的刺激,他那颗未曾轻松的心灵少受一次摧残!

惨痛的教训 深长的启示

面对已经远去而精神长存的黄万里先生,面对依然矗立却形同鸡肋的三门峡工程,业已逝去

的历史让我们无奈,我们只能咽下已经酿就的苦酒。对于今人乃至后人而言,惟有从中汲取教训,省察得失,增长智慧,增强理性,从黄万里的悲剧人生和三门峡工程的尴尬处境中梳理出更多有价值的思想,这段“殷鉴不远”的公案才能发挥更大的历史教益。

第一,在哲学的层面上,它提出了如何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掌握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工程曾被赋予浓烈的政治色彩,从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到亲历其事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冀望由此一次性地实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海晏河清”历史上“河清”就是黄河)清”的梦想,满足“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和心理需求,以致在善良的动机所汇聚而成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激发出来的主观能动性面前,黄河在水文、泥沙、生态和人类影响活动方面所具有的复杂性被淡化了,自然界内在的客观规律被漠视了。结果,三门峡工程建成之日,就是弊病显现之时,显然,历经40多年沧桑风雨的三门峡工程是一项违背客观规律、为害大于造福的失败工程,善良动机下放大的主观能动性带来的是后患无穷的恶果,并承受着千秋功罪的评说。三门峡大坝上依稀可见的“黄河安澜,国泰民安”依然是一个梦想,它无情地昭示了一个真理:人们只有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二,从政治运作的方式上,它提出了怎样决策、遵循什么样的决策思路和决策程序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决策,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公共工程的决策,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需要决策者权衡利弊、排比得失、趋利避害,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需要断然摒弃一厢情愿、好高骛远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让决策更科学,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论证机制,真正做到兼听则明;怎样通过民主的方式防止决策脱离理性的轨道,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凡错误的决策,劳民伤财,贻害无穷,而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形成的正确决策,则产生福祉,利国利民,它来源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正是三

门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所严重缺乏的。人们轻信甚至盲从无治沙经验的苏联专家的说法,从遵照最高行政领导和树立形象出发先入为主地论证工程的可行性,工程存在缺陷后又缺乏有力度的纠正。更要命的是,对反对者的忠告置若罔闻,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宽容反对意见的胸怀,造成了权力对科学的排斥和压制。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国情决定了这样的事情几乎难以避免,这就使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失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给我们留下了活生生的标本。

第三,从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它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少数人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样一个事关民主建设的重大问题。言论自由乃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漠视的。中外科学史的许多事例都反复证明,科学的真理具有独立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之外的属性,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万里的遭遇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判断,这就提醒执政者和社会各界必须重视少数人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异见”、“另类”的声音或许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或对更多可能性的预见。在这种声音面前审时度势慎重行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人为地回避、忽略乃至压制这种声音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在三峡工程的论证结束之后,有人坦言:在为三峡工程做出贡献的人群中,不该淡忘那些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们,正是由于他们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提出一条条在相关领域有相当分量的反对意见,为决策者们提供了宏大的视角和多维的思路。我们理当为这种对反对声音的重视叫好,这无疑是在观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可惜复可叹的是,坚持反对三峡工程并先后六次上书中央领导同志的黄万里却未享受这样的待遇。或许是将几十年治黄工程批得体无完肤的缘故,或许是对他的成见太深,或许是闭目塞听的顽症在水利界中的一些人中根深蒂固,黄万里未能受邀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他反对三峡工程的陈述没有得到任何回响。2001年9月4日,在黄万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一个学生不无遗憾地说:“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这种象征意义正是黄万里的价值之所在。

第四,在衡量知识分子的作用上,它提出了在政治权势和科学真理之间,知识分子应如何取舍这样一个关乎其价值取向的重要问题。在促进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解决人类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诸多挑战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以学问贡献社会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这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科学的真理,更在于对这种科学真理的坚持上。坚持真理是一种操守,特别是在与政治权势发生冲突、与传统的社会观念正面碰撞时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它意味着为此损失个人利益、付出沉重代价乃至身家性命都可能在所难免,它特别能够考验知识分子意志和品格。一介书生黄万里以他的坚持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良知,保持了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他的坚持还在于他坚信科学的尊严不容践踏,真理的声音不会湮没,终将发挥穿透历史、穿越时空的光芒,这使他断然放弃了乃父黄炎培一直推崇的“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以外圆应付生存,以内方把握正义”本是复杂形势下一种巧妙的应对策略,可以较为周全地自保,黄万里不是不明白其中的玄妙,也不是不明白固执己见会给自己带来可怕的伤害。事后,有人问他,你明知会遭惨祸,为什么还要直言?他说:“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他真正做到了忠荃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伪饰。古人云:“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立志报国、终身不渝的黄万里赋予其新的内容,正可谓鲁迅所激赏的“民族的脊梁”!

历史往往充满着诡秘的逻辑。站在科学巅峰上的黄万里是孤独的,他的见解只能在经历时间的淘洗和实践的检验后方被社会认同。追问历史,直言无隐的谏诤者何以寡?答曰:备受歧视,打入另册,掉进深渊。曲学阿世的诺诺者何以众?答曰:患得患失,明哲保身,一帆风顺。于是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傲慢的苏联权威前,就出现了“足将前而趑趄,口将言而囁嚅”的人们。

一位水利专家和一项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至此应当结束了,但其所留下的警示意义则将日益彰显。透过浑浊的黄河水来看黄万里一生忧郁的眼神,三门峡工程也必将成为世人拷问理性、良知的墓碑。(责任编辑 萧 徐)

重新评价张闻天莫斯科留学

● 张培森



张闻天(右)与胞弟在莫斯科合影

位于莫斯科市区西南沃尔洪卡大街16号一幢四层楼房,看上去是一座很普通的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却记录着一段中俄特殊的历史。70多年前这里原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这就是多少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国人都知道的著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的邓小平,台湾的蒋经国都曾经就读过这所学校;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杨尚昆等一大批中共的老革命家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这是1925年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苏联政府提议建立的,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培养中国革命人才的一所大学,因此学员除了共产党员外,国民党当初的一些政要也都进过这所学校。张闻天则是由中共1925年冬指派的最早入学的学员之一。

1996年笔者为搜集张闻天史料曾来到过这里参观,这是一座坐东朝西的长方形建筑物,据

说校园原来有围墙,后来倒塌了,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楼前有一片不大的白桦树林。记得我们搜集史料的一行三人参观的那天天气很好,和煦的阳光照射在高高的白桦树林里,衬托着这座大楼显得格外的平静。可是人们岂知隐藏在这座大楼里7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风云却并不平静。

学校开办之初,也是张闻天入学之际,中国革命正在步步走向高潮。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很快占领武汉重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终于取得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然而不久风云突变,几乎不到半年时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就惨遭失败,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大革命就像一串燃放的爆竹,响声之后摆在人们面前的竟是一摊碎屑。国共分裂,蒋介石搞白色恐怖,共产党转入地下。而这时候从苏联来说,却正是苏共内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发生激烈争论,以至演变为一场残酷打击反对派的党内斗争。双方当初争论的一个焦点恰恰就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这样,一方面是国内革命起落的客观形势引起了学员们思想的激烈震荡,另一方面苏共内部的党派激烈斗争又直接影响着这所受其控制的学校,加上学校内有米夫那样权赫一时的人物从中操纵,下有王明这样的人物仗势挑动,搅得学校内部纷争不断,最后以一次“清党”停办而宣告结束。

张闻天在莫斯科留学长达五年,其中有三年是在中大,最后两年转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但同时还在中大兼课,与中大仍有工作上的

来往和联系。因此如何评价张闻天莫斯科留学,尤其是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学关系这段历史,确实是涉及到评价他人生转折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人云“人生三十而立”,那么处在接近“而立”之年边缘的这段人生经历,究竟又是给张闻天后来的人生发展带来了什么呢?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是既是给他带来发展创造的机遇,又是给他种下了后来令其痛苦的祸根。因为没有莫斯科这段长时期的学习,就不会有后来作为中共一位杰出理论家的深厚理论基础,没有通过这段学习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也不会有后来能够走进中共高层领导,以至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创造出那样辉煌业绩的最初条件。然而自打40年代延安整风批判教条主义以后,莫斯科留学就成了他“教条宗派”这条罪状的源头,也可以说是几乎成了以后屡次党内挨整的一条“原罪”。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这段人生历程?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随着近年来大量原始材料的公布,和张闻天生平史料的不断发掘,人们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对造成他“原罪”的这段历史做一点客观的评论了吧。今天我们如果根据全面的事实来看,实事求是地说张闻天的这段历史表现应该肯定错误是有,然而后来在整风批判时显然是被夸大了。

如前所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大内部的斗争日趋复杂,在这种复杂斗争中学校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拥护贯彻苏共和共产国际路线的学校领导“支部局”一派,和反“支部局”的一派。张闻天无疑是属于拥护国际路线“支部局”一派,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几个时期的派别斗争之中。而他之所以被卷入这些斗争,当然主客观原因很多,但从他本人来说,主要是出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如他后来检讨时所说,那时“我对苏联领导同志(过去是斯大林)有过迷信”。

而这一点也是与他当时在学校中所处的地位有关,他留过美,英语好,出国前在国内文坛上已经算是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因而从入学起就得到学校的重视,一开始就在学校里处于一种比较优越的地位。当初由于大部分中国学生开始都不懂俄语,于是学校起初通过英语做桥梁,把懂英

语的学员组成一个班,一边学习一边充当翻译,张闻天和王稼祥、吴亮平等都编在这个班。张闻天通过英语又很快掌握了俄语,四个月就又能开始直接用俄语进行翻译。1927年春斯大林来校演讲,张闻天和沈泽民等四人轮流担任翻译。而学校中这些担任翻译的学生,又大都是文化稍高的知识分子,因此不但教学中充当翻译,而且其中一些人还兼任教员,并在学校重用之下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张闻天就一度担任过支部局候补委员。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些人同上层比较接近,观点上自然多数站在拥护支部局的立场上看问题。加之张闻天学业出众,会写文章,在学校算得上是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因而在纷争中也就自然被对立派视为目标受到攻击。

在中大派别斗争中,王明起初也是翻译,由于观点基本相同,在争论中张闻天同王明站到了一边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应当指出,拥护支部局一派的人并不都是王明一伙的,而张闻天在那时同王明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对此比较了解当时情况而且持公正观点的老同志有所评论。1987年我们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的几位同志访问过年近80高龄的原国家外国专家局顾问杨放之老人,他是同张闻天1925年同乘一条轮船离开上海去苏联学习的。老人在中大学习时曾经因为支持中共代表团的意见而遭受过王明一伙人的打击,但他谈及张闻天时却特别强调他同王明的区别。老人诚挚地对我们说:“张闻天比我的年纪大,去莫斯科前他就在学校教过书。他给我的印象好,有学者、长者风度,总是平平静静,不像王明那样张牙舞爪。”他认为张闻天同王明虽然都是属于一派,但是他同王明不一样,他“不搞派性”。还说:“张闻天在中大时热衷于研究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他为人厚道和蔼,不像王明疾言厉色,也不像博古锋芒毕露。在反托派斗争中他很积极,搜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搞学问,不搞派别(活动)。”

事实上,编辑组访问过的所有在这一段莫斯科接触过张闻天的老同志,尽管过去历史上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谈起张闻天时,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得出与杨老相同的印象。这里还应举出另一位对张比较深知的吴亮平老同志的回忆,他在1985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莫斯科同张

闻天一段交往时说，那时王明同一些人拉拉扯扯，对不满意他们的人则是不择手段进行打击，他本人就是遭受他们打击的一个，但闻天同志，尽管王明使劲拉拢他，却不愿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专心埋头于学术研究。对于我，他始终是爱护的，有时并把王明一伙要想打击我的情况告诉我。当1927年全校党员大会通过我由团转党时，闻天同志成为我转党的五个介绍人之一。往后在中山大学党内生活中，王明一伙不断诬陷打击我，闻天同志如同往常一样，根据事实为我作了正确说明，使我亲身体会到闻天同志为人的正直和作风的正派。”

张闻天当时热衷于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屑于搞帮派活动，这一点从我们在俄罗斯收集到的档案资料中也多少得到佐证。他本人在1928年填写的一份表格中写道：“对于学习极感兴趣。每种功课都能引起我的注意。最初二年内，极努力一般政治经济知识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及俄国党内争论，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曾特别用过功。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对于中国革命问题，虽想加以同样的研究，苦无时间。”在回答“学习过程中，感觉到有什么困难”问题时答道：“因为我进校后即担任很多口译笔译工作，所以虽想自己努力研究，常苦于缺乏时间。没有时间，实为我在学习中最大的困难。”

从以上这两段简单回答的文字可以看出，他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迫切心情跃然纸上，“苦无时间”多学一点，何来时间去搞派别活动？由于学习认真肯下功夫，因此无论在中大还是后来的红色教授学院，张闻天学习成绩的评语也一直是好的。这里仅举出1930年6月红色教授学院张所在的研讨组对其学年成绩的两段评语：该生“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和提纲，作过一次发言。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表现出有能力和善于正确提出问题，并对俄国和外国文献十分熟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做科学研究工作是合适的。”评语还说：“他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年中山大学改称此名——笔者按）中以党小组的领导者的身份做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也做党的工作，对此有积极的

反应。他积极参加党小组的工作。党性坚强。守纪律。”鉴于其完成学业的情况，将其升为三年级，同时责成其秋天通过德语测验。”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张闻天等这一派人得到米夫以及共产国际的重用这个问题，深知当时情况的杨放之老人同编辑组同志的谈话中有过这样一段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说：

所谓“二十八个半”，就是所谓“教条宗派”，我认为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按照他们的意图制造出来的。他们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理论不行。瞿秋白最初到莫斯科时，斯大林给他们讲过话，说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曾表示中国党理论水平不行，萌发了领导干部要换班的思想。31年米夫在四中全会上把王明扶上台，不是他个人的事，是斯大林在后面支持的。这是苏联党致命的弱点，就是要做老子党。他们要挑选有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懂俄文的人来担任中国党的领导工作。当时苏联有些工作人员，当着我面就说你们回中国是“潜在领袖”，可见这是上面的意图。张闻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选的，因为他理论、俄文都学习的很好，有学者风度，所以米夫选中了他。但他本人不搞派性。

从“苏共、斯大林意图”上来观察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派别纷争，杨老这番话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须知当时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唯一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执政的党，而斯大林则至少是已经坐在苏共领袖位子上的领导人，而且他们手中有一个重要的旗帜，就是要维护列宁开创的苏联共产党的统一，要保卫苏联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利益的唯一代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他们青睐和重视的这一派中国知识青年，除了极少数确实存在品德问题之外，应该说卷进一些错误斗争的多数基本上是属于认识问题。

事实上张闻天整风中尽管按上头定好的调子上纲上线检讨莫斯科中大“教条宗派”问题，但是从个人的交往活动上却申明他与王明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同过班，平时不接近”，也并无对他尊重之意”；而从我们搜集的材料中迄今也确实没有看到张闻天参与王明什么阴谋勾结的宗派活动，相反倒是在莫斯科中大档案的一份

材料中看到他那时就认为陈绍禹(即王明)比对立派的周达文更危险的说法。

个人来往都很少,而且对其人有一定的看法,怎么能算成一个“宗派”,显然张闻天在整风中的这种检讨是带有违心成分的。那么这种违心的检查在延安整风中又是怎样搞起来的呢?经查考1945年中央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左”倾错误属于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只有“宗派主义”的说法,却并没有党内存在过一个“教条宗派”的说词。然而实际上从1943年毛泽东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党内存在两大宗派,即一是“教条宗派”,二是“经验宗派”之后,即给检查错误定下了基调。从此,批评者即按此进行批判,被批评者即按此进行检讨。偏激之词便不断升级。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也是当时领导整风“总学委”秘书的胡乔木90年代回忆当年整风时都认为当时许多人的发言都有偏激之词,他在评议当时会议情况时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即张闻天)、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今日如果我们对此认真思考一下,应该说将过去莫斯科中大得到共产国际赏识和重用的一派人笼统地说成是一个“宗派”,这至少在用语上是不准确的,对此已有老同志写的专论延安整风文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宗派”是一种组织,而且说在党内搞宗派一般指的是不合法的“小团体”、“小组织”,是一种分裂党的行为,是党章规定所不允许的。然而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国际对各国党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中山大学的“支部局”就是苏共的一个基层组织。因此尽管米夫、王明这些人在操纵中大派别争论中采用了一些卑劣的手段,但从今日来看,他们是贯彻上面的意图,手中完全掌握着合法的旗帜的。抛开这个前提而把所有当时得到领导重视和重用的这一派人都说成一个“教条宗派”,这就势必要迫使像张闻天这样一些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拥护共产国际,站在国际路线上的同志不得不进行违心的检讨了。

既然被认定是“宗派”,那么其中的成员是哪些人?于是在整风“脱裤子”、“割尾巴”的号召下,检查者纷纷交待过去莫斯科中大的派别斗争情况,凡是留学过莫斯科多少接触过一些这方面情况的人也纷纷回忆和揭发。这样,一个后来历史上流传很广,以至直到今日还被一些不负责任者进行炒作的名词,第一次成为党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所谓“二十八个半”原不过是当时中大两派一次激烈争论中,一派讥嘲另一派的一句戏语。

1929年夏中大校内举行过一次讨论学校支部局工作总结报告的党团员大会,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十天大会”。会议起初是讨论支部局的工作,后来却发展为焦点集中到支部局的路线问题上来,一派认为路线是正确的,另一派人则认为路线就是错误的。最后会议进行表决,有人说,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而对立派就送给了拥护支部局一派一个讥讽的称号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又有人说,拥护的人中还有一个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团员,于是加了这“半个”,成了“二十八个半”。可是据当事人杨尚昆说:“二十八个半”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一是表决中支持支部局的不是28票,而是90多票,所谓“半个”更是不可能,因为团员根本就没有表决权;二是投票支持的人当中并不都是王明一派的人,例如吴老(吴玉章)本来是对支部局有很多意见的,但有人提示他首先要说支部局路线正确,然后再说缺点。吴老当即表示,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便投了支持支部局的票;三是被认为是“二十八个半”的有些人就压根儿没有参加会议,更谈不上投票。(张闻天说他本人和王稼祥、沈泽民因为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事实上尽管这个话题整风中炒得很热门,结果却始终谁也没有能拿出一个经过查实的“二十八个半”的确定名单来。

然而就这样一句本属于虚乌有的戏语,却不但在40年代整风中成为像张闻天这样一些留学过莫斯科后来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的一条不成文的罪状,而且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提出“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之后,那些被

列在他们认定的名单中还活着的同志,几乎都没有能逃出一场大劫,关押的关押,整死的整死。有鉴于“二十八个半”名词原来就不合乎事实,后来又成了坏人的代名词,整人的帽子,造成了极大的混乱,198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专门就此召集有关老同志座谈讨论,最后郑重建议今后党史中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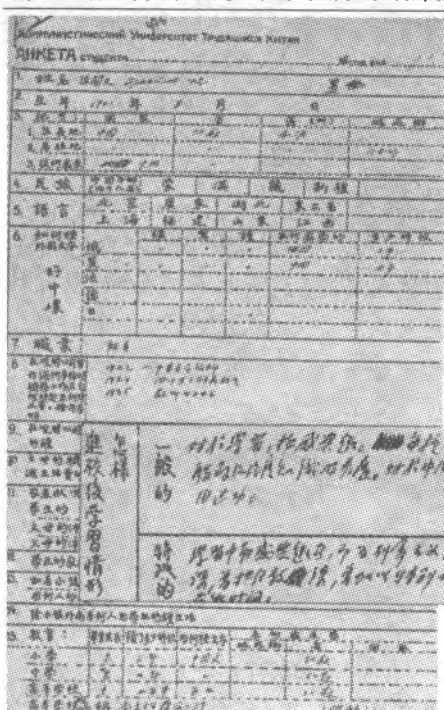
其实如果是真正要总结历史教训的话,根子恐怕还是要追到苏共。在党内如何对待不同意见问题上,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总是动不动就把一些持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同志视为异己,将他们说成有纲领、有组织的“宗派集团”以至“反党集团”,说他们是阴谋篡党或者是分裂党,组织全党批判,最后视为敌我矛盾进行处置。“教条宗派”这个词在最终查不出组织系统的情况下毛泽东有一个特别的说明:“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这里且不说这种说明很牵强,因为这些受到共产国际或者说就是苏共重用的一派人实际并没有什么真正独立的纲领,而说到共同的思想便可以算做党内的“宗派”,就更是为后来的以思想论罪开了先例。因此如若说“二十八个半”虽与具体事实不符,但却是当时激化矛盾的结果,折射出一些人对苏共那一套压制民主方式的不满的话,那么后来我们

党又反过来拿它来惩治异己,恰恰说明我们也从老师那里搬来了这一套,历史上遭受过这套传统

打击的毛泽东自己,最终也没有能摆脱这套恶劣传统的影响。

当然我们这样来评说,并不否定张闻天在这段历史上的错误,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当时的错误主要应该说是认识上的错误,也就是所谓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过这里也需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首先,他和其他一些留俄的中国同志在那时翻译了不少马列的书籍。在翻译马列著作方面有过贡献的,并被毛泽东喻为如大禹治水有功的吴亮平,就对笔者说过他同张闻天在莫斯科时就一起搞过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这本书的翻译,果然我们编辑张闻天著作小组1996年赴俄搜集史料时,就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发现一本1929年经张闻天翻译的在苏联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中译本,复印带回国内后经过专家鉴定,这是迄今这本著作最早的中文译本,后来又在这个版本基础上在延安出版了经过校订的国内的中文译本,译者署名吴黎平、刘云(即张闻天)。第二,并非主观上就热衷于“教条”不想联系中国实际。他在1928年学校征求意见时,就表示了这方面的要求和意见:“想对中国问题加以详细的研究”;建议“各种教材应尽量中国化”;“多讨论中国党内的现状,及最近发生的问题”等。但是由于远在国外,加上学校脱离中国实际的教育方针,学习中不能不受到这种客观环境的限制和错误方针的影响。第三,从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来看,显然有不少是错误的,如按照共产国际东方部指定课题写的“鼓吹白色恐怖下举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冒险行动的文章”,还有站在共产国际“加紧反对富农”的立场上强调“忽视富农的特别危险性”的文章,以及照搬“国际”的观点宣传“反对右倾是各国党的主要任务”的一些文章等。然而要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整个路线指导上就是错误的,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又都还处在探索之中。可贵的是他后来回国经过一段实践之后,不但较早地发现错误,而且不断纠正错误,在拨正党的航向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第四,还应该看到就在这一时期也写过一些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或者说主导观点是好的文章。例如有人回



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时所写的简历

忆 1926 年春国内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正当中大中大学生中共产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激烈辩论时，张闻天在墙报上贴出质问国民党派驻中大代表的公开信《质问邵力子》，批评和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背叛国民革命的言行，在澄清当时学生中的思想混乱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如 1930 年 5 月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尚未在中共中央形成统治地位之前，张闻天看到了国内党在工作中出现的过左的迹象而写下的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文章《论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各国共产党内的斗争，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是要反对右倾与反对‘左’倾的斗争。”“忽视从‘左’的方面来的危险”与“看不到右的危险”同样是很大的错误”。他在那时就提出这样的论点是很难得的。

对于张闻天，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五年的学习和深造使他获得了理论上的提高，正如杨尚昆所说：“闻天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习和工作，为他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他在中大读书非常勤奋，曾经当时与他同过学的李敬永回忆说：“闻天同志学习非常努力，早晨起得很早，我也是一个好早起的人，可是每天我起床时，总见他已坐在教室里读书了。”事实上他不仅勤奋读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主动学习，善于钻研和思考问题。根据我们接触到的当事人的回忆和文献史料来看至少有以下两件事值得注意。

一件事是 1927 年暑假他利用假期在休养地带头发起组织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他当时联络了一、二两个年级中学习好、懂英语的同学参加，其中二年级的有他本人和沈泽民，一年级的有沈志远、李敬永等。并且请了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贝林（Белин）在课外用英语开专题讲座，组织大家深入讨论研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闻天过去留学美国时就养成的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至此不减。他在三年级编入教员班时虽然分的是列宁主义研讨组，但有时他也参加政治经济学研讨组的活动。人们知道，后来他回国不久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可是人们不好理解的是刚回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1930 年 2 月 17 日回到上海，6

月 15 日写成此文），为何就能写出这样一篇引用大量经济数据的、理论分析透彻并且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四万余字的长文？现在看来他是早有准备的，须知他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理论界就已经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占上风的一派观点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封建社会，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农村。当时这个观点很流行，在中大的中国学生中也有这样的观点。而张闻天正如杨放之所说，在反托派斗争中很积极，但“他搞学问不搞派别”，“搜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样看来，他在回国后不久，能写出那样一篇批驳托派关于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错误观点的力作，就并非偶然了。

另一件事是他 1929 年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期间写了一篇长篇哲学论文《哲学战线的当前分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任务》。这件事人们过去从来不知，直到 1996 年我们张闻天文集编辑组赴俄罗斯搜集他的史料时才终于发现。这次搜集工作总共进行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因为那里集中收藏了过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档案史料，后来俄国同行专家又告诉我们莫斯科还有一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但他们也不知道那里是否有张闻天的资料，于是工作快要结束之前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一次，却意外地发现了这篇论文。全部是用俄文写的，一叠密密麻麻的俄文打印稿 85 页！这是张闻天花了 3 个月的时间写出的一篇学年论文。

国内有的哲学专家看了后认为这是一篇有理论深度的历史文献，它对于了解苏联 20 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于学习列宁的哲学著作均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机械论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依笔者现在来看，从此文中至少可以看出张闻天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是下了功夫的，但他并没有沉溺于纯理论的研究，明确提出“必须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当代一切紧迫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 1925 年至 1927 年中国革命中党从放弃领导权的（下转 38 页）

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与谭启龙的交往

● 胡德平

谭启龙伯伯长我父亲两岁。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他们两人作为红小鬼,在湘赣苏区结成的兄弟情义,持续了五十八年并成为终身的朋友。作为后代子孙能有机会研究体味这段历史,令人愉快。同时还应抱一慎终追远,面向未来的态度,继承这份遗产,不没先人教诲。

一、一张照片

2003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谭启龙回忆录》,书中生动、翔实地记录了谭伯伯光荣、多彩的一生。他出生在江西永新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母双亡后,无力上学,自小便给别人做了放牛娃。

湘赣边界是土地革命的策源地,秋收起义使这里的人民最早投入了武装斗争的革命洪流。井冈山就在永新县的近旁。谭伯伯早我父亲一年,于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两人相识于1931年的湘赣苏区。

苏区的群众不但青年、壮年大批参加红军,就是8岁到16岁儿童也组织了儿童团和少先队,一齐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保卫地方政权。

湘赣苏区在永新县沙罗洲曾举行过三次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大检阅,第一次是1931年5月,第二次是1932年5月,第三次是1932年5月下旬。三次检阅中,最为盛大的是第二次。据回忆录记载:“1932年5月,少共湘赣省委举行了全省少先队、儿童团总检阅。检阅的规模很大,有20多个县的少先队和儿童团派代表参加,共计近万人。在永新县城沙罗洲广场扎了三个大检阅台,王首道等省委领导和冯文彬参加了检阅。检阅的

内容有:军事表演操练,项目是列队、刺杀等,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各自统一服装,背着大刀,扛着梭标,威风凛凛地通过检阅台,然后进行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分别考试少先队、儿童团组织的基本知识;文艺表演,各代表队演出了许多精彩的文艺节目,进行歌舞比赛。最后进行评选,给优胜者发了奖。”

永新县虽是湘赣苏区的首府,但毕竟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一座偏远小县。这里的群众祖祖辈辈还未见过这种万人大检阅的场面,况且还都是娃娃们组织起来的盛大活动,其震撼影响可想而知。不期而然地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竟然得以保存。这张照片真实地拍摄到那次大检阅的一瞬:木架搭起的检阅台上站满了人,检阅台两侧竖起的木杆上横挂着大检阅的会标!整个检阅台上扎满了花朵,广场上排序整齐,列队而进的少先队、儿童团的队伍。这不是和平时期的欢庆游行,检阅之前、之后都有残酷的战斗发生。第二次永新大检阅刚刚结束,就有500多名少先队员集体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张照片我在军事博物馆等地见过不止一次,我父亲也提起过这帧照片,并问我在照片中找到他没有?我说没认出来。他不以为忤,继续高兴地说:“那上面有我!”当时他是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现在想起来,这张照片如果有我父亲,也可能会有谭伯伯,因为当时他是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部委员会主任、省少先队总队长。两人又同是少共省委的执行委员。他所负的责任理应还要比我父亲更重一些才对。这些细节、人物和故事,还需对此照片认真考证一番。同时我还想知道,在这帧照片中,还有谁的名字能被回忆起来,更多的人虽然在照片上留下了自己

天真稚气的面容,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恐怕再也无人知晓了。他们不少人将作为无名烈士永铸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告示后人,苏区8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们为祖国为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

二、泪为谁流

革命回忆录中,很少描写革命者的泪水。谭伯伯《回忆录》中有一段对感情宣泄、抽泣流泪的生动描写:1928年秋,15岁的谭启龙给山里的亲友送饭,经常看到亲友们在山间密林的窝棚里悄声密语。有一次,他出于好奇在棚外偷听,忽然听到里边的人讲:“党指示我们……”,“对,暴动!先消灭挨户团!”“打倒土豪劣绅!”“给穷人报仇!!”这些话字字句句打动了他的心。他的母亲就是被挨户团拳打脚踢,口吐鲜血含恨而死的!此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情不自禁地呜咽抽泣哭出声来。泪水为谁而流?为失去的母亲,为自己的身世,为穷人不再受穷。自那时起,他就认定了共产党,跟着亲友们参加了红军,迅速成长起来。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我党十九块根据地之一的最高负责人。建国后又曾任四个省的第一书记,成为独当一面,运筹全局的高级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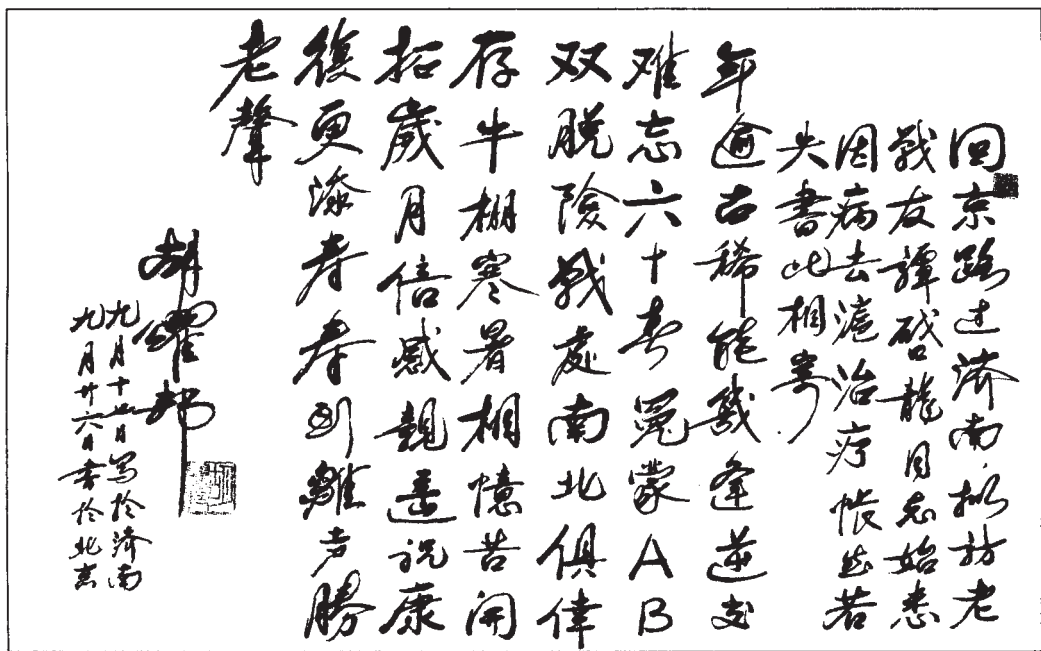
我看过谭伯伯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真

诚的友谊》,至今还有印象。文章说到在湘鄂赣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时刻,谭伯伯负伤,和卫生员、警卫员、挑夫老柯四人潜伏在幕阜山中。因谭伯伯伤势恶化,警卫员冒险下山买药,得知国共合作的消息后,非常兴奋,特地买了一只鸡、一袋米,又雇了一副担架。当他在约定地点高喊首长和战友的名字无人应答,一时找不到谭伯伯时,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那时谭伯伯24岁,小警卫员也只有十六岁,还是上中学的年龄,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结成的同志友谊竟是如此深厚,让我们后人看来,难以理解,更难以忘怀。当时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们的稚气和成熟,天真和现实,情感和理想统一在一起,反差极大,但巨大的反差又那么真实感人,动人肺腑。

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一路上,我骑车,他坐三轮,其表情也还平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母亲已在此等候多时,我站在他们身旁,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的一声竟然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一边抬头看看祖母清癯遗容,一边从旁瞅瞅父亲那神

态,泪水也涌出眼眶。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复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谭伯伯的回忆录中,说到1932年底,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他



胡耀邦手书

和父亲列入“AB团”反革命分子名单,在生死危亡之际,冯文彬同志敢作敢当把他们两人带到中央苏区,脱离了险境。谭伯伯以后没有再受审查,我父亲仍然在被审查之中,这使他很苦恼。一次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到我父亲所在单位指导工作。一天晚上我父亲鼓足勇气,敲开他的房门,向顾作霖同志诉说了他的家庭、经历,如何参加共青团,如何离家来到莲花县苏区。激动之处,竟已是边诉边哭起来。顾作霖听了大半个晚上,也是动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个14岁的儿童出来参加革命,有什么根据去当特务加入反共的AB团,他看出了父亲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断然作了不再继续审查他的决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谭启龙回忆录》对这段历史有如下评论：“现在看,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肃清‘AB团’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许多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被错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和极其痛心的损失。在当时极左错误盛行的高压之下,冯文彬能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三、以诗相别

谭启龙伯伯作为红军中的后起之秀、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参加过党的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党的代表大会,实不多见。为何他未参加党的九大,反而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呢?

据我所知,九大之前,经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解放了张宗逊、范文澜和我父亲少数几个八届中央委员,他们还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当然了,会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蒙准参会,当然要做许多自我批评,光自我批评还不够,还要自我无限上纲,最后还要批刘批邓!我父亲毫无例外地也要这么做,但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与喧闹的会议很不合拍。他对文革彻底的反思、认识和批判是在林彪事件以后。这时他还是想跟上文革的发展形势,总认为文革中的错误会由上边自己改正过来。最后他总是失望,但又不断存以希望。九大中央候补委员的预选名单有他。他当然也盼望着早日出来工作,但又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形势。

他深知对广大干部来说,早日解放,出来工作的机会是多么可贵。思考再三,他决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作了一番表白,表示自己的错误严重,思想认识一时还上不去,建议自己不要再作为候补中委的人选,提出可否另换一人。这人的经历应和自己相似,但对错误的认识要比自己好。并提出谭启龙同志的名字。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以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谭伯伯被选入候补中委。这里要说明的是,谭伯伯对文革的认识,他也不了解,但他对谭伯伯有个基本的认识,谭伯伯绝不是什么走资派,他希望像谭伯伯这样的老同志能多出来几个,再为人民做些工作,毕竟他当时只有55岁。

谭启龙伯伯确实也是一个饱经考验,具有高风亮节的老前辈。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先后主政青海、四川省委的工作,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1982年,在他68岁时,谭伯伯率先向中共中央提出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1985年又主动卸去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为此邓小平同志手书“人间重晚晴”条幅相赠谭伯伯。

1988年9月,我父亲和母亲在山东休养,访谭伯伯未遇,他怅然若失,曾写诗一首相赠,此后两人再未见面。父亲去世后,此诗寄去谭家。现全文录入,以兹纪念: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

九月十七日书于济南,九月廿六日书于北京。

最后一句套用的是唐人诗句,叶帅也曾将此句改用入诗。都是寄希望新生力量,支持后起之秀的意思吧。

谭启龙伯伯是一位高寿的跨世纪老人,他高高兴兴地参加完党的十六大,于2003年1月22日去世。他人生的句号划得十分完美。

(2004年5月10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送别老宋

● 王景山

直到最近我收到《炎黄春秋》第六期,突然发现特邀编委名单中“宋文茂”三个字加了黑框,才知道老宋已经去世了。

他是何时去世的呢?我完全不清楚。此前我没有收到过讣告,当然也不知道是否举行过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他病中我们曾多次通过电话,他在家,或在医院里。今年春节前后,我和老伴几次要去医院看他,他总说不必,还在定期化疗,情况正常。他大概是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我们便也以“情况正常就好”来安慰他。明知总要化疗不是好现象,但在我长期形成的印象中,老宋是条意志坚强、精神昂扬、精力充沛的汉子,心想他应该会好起来的吧。可是他终于走了,我们也终于未能见他最后一面。现在只好以这篇拙文来送别老宋了。

在日常见面或在电话里交谈时,我总喊他老宋,他则喊我老大哥,因为我比他痴长几岁。不过这是到他《炎黄春秋》以后的事,以前,我们互称同志。1979年,我被错误地开除党籍21年之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得到改正,回到党内。宋文茂同志在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来到师院,先后担任了党委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顺便说一句,他原先的老伴陈荫芝同志“文革”前是我们中文系的总支书记。

其实老宋对我倒好像他是老大哥,时时开导我,督促我,鼓励我。1984年他正任师院党委宣

传部长,为了向学生进行热爱师范专业的教育,要我写了一篇《我的老师》,发表在校刊上。过了几年,他已当了纪委书记了吧,又建议并张罗让学校为我出一本小册子,把我陆续写的十几篇有关学生学习问题的短文一齐收进去。一本题为《向同学说》的小册子,终于在1990年校庆前夕,由师院教务处印出来了,薄薄的,但印的很精美,紫红色有暗纹的封面,是请美术系教授戴克鉴先生设计的,另又请书法教授欧阳中石先生题写书名。这些难能可贵而又麻烦的事都是老宋一手操办的。

我和老宋进一步成为知己,真正成为可以无话不谈的同志,是在他加盟《炎黄春秋》并担任了副社长以后的事。应该说也正是从此时起开始了他的辉煌的晚年。后来他升任常务副社长,说明了《炎黄春秋》和杜导正同志对他的倚重。

在我印象中,他对《炎黄春秋》杂志的确是视同亲人,不辞辛劳,爱护备至的。从创刊号起,每一期我都得到一册赠刊。我是一见钟情,也特别喜欢这个杂志。不管是他亲手交给我的,还是后来邮寄给我的,我们都会当面或通过电话议论一番,双方都非常积极主动。我和他已经是老熟人了,对现实许多问题的看法又大都相同,说话也就互无顾忌,有所争论,也很容易取得共识。议论什么呢?主要是我对《炎黄春秋》办刊宗旨、原则、意图及其风格特色的理解和建议;对刊出文章的评论,哪些我认为好,我喜欢,哪些我不大喜欢,哪一类文章最应多有,哪一类则可登可不登;指出所刊文章中的瑕疵,包括错别字、用词不当、史实有误和我自以为的某些论点看法值得商榷,等等。

由于我在《炎黄春秋》杂志面前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因此再三嘱咐老宋我的意见只是说给他个人听的,和他个人探讨的,不足为外人道。也许老宋还是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导正同志了,我终于在老宋的鼓励下写了《我喜欢炎黄春秋》一文,并被拿去发表在1994年第八期上。我在文中主要是强调了“治史”需要“史胆”和“史识”。我说:所谓史胆,就是敢于发掘历史真相,敢于直面历史事实,敢于秉笔直书,敢讲真话,不做瞒和骗的蠢事;所谓史识,就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既十分注意主流和九个指头,也不忽视支流和一个指头,在左转弯的迷雾中寻找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求得真实,求得真理。”也许又是转达导正同志的意见吧,老宋要我再写一篇《既有史胆,又有史识》,后来他们拿去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

这年初冬有一天老宋忽然很是郑重地提出,要我写一篇阐明《炎黄春秋》办刊原则的文章,计划发在来年第一期上。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我怎么能写呢?老宋不高兴了,脸也涨红了,连说你看,你看,你看,怎么还是你们“你们”呢?你就是咱们”!咱们商量商量,看怎么写,最后你执笔。

翻阅一下刊物,1991年7月1日创刊号无发刊词,只从所发表的文章可以大致看出它办刊的宗旨和取舍标准。次年第一期首页刊有编辑部的《新春寄语》,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为何办刊问题和刊物内容做了说明,未及其他。1993年第一期在杂志末一页刊出了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新年新话》,申明办刊宗旨方针不变,强调“坚持忠于历史,面对现实,敢讲真话,不拘一格”。1994年第四期《编者寄语》里提出了《炎黄春秋》力图把握的“一种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求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力求发

表的每一篇文字都情之殷殷、言之凿凿,道人生之真谛,还历史以原貌。”

参照以上各文,又经导正同志和老宋提示,最后由我执笔写成了一篇题为《尊重史实是本刊办刊的原则》的文章,署名“本刊编辑部”,作为“开篇”刊于1995年第一期。我现在想,导正同志的理想和追求应该说是这篇重要文章的灵魂,老宋协助支起了框架,而我只不过是根据我读《炎黄春秋》的感受,结合我对治史和办刊的一些看法,用自己的语言,补充了一些事例,并借此发了一些议论而已。哲人已逝,我这也算是还历史以原貌吧!

此后我的确有些自居为《炎黄春秋》的自家人了。回想老宋在《炎黄春秋》的十几年间,他不断督促、鼓励和支持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馈我对杂志的意见和建议,这一点我觉得义不容辞,是努力以赴的。二是争取多参加一些杂志社的活动,如座谈会之类。这一点我是勉力而为。仅有的两三次发言,都是导正同志和老宋再三示意的结果。三是给杂志挑毛病,这一点我倒真是大力去做的,包括核对校正一些可能有误的人名地名年代史实,改正一些可能误写误排的错别字词。我曾向老宋一再提出,我希望做一个义务的编外校对。他又不高兴了,你开什么玩笑!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总认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宋文茂夫妇

历史现象的看法,见仁见智,容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所根据和引用的史实绝对不能有误,字词错讹也是严肃的刊物不应容忍的。有错必纠嘛。

忘记是哪一年了,老宋告诉我要让我当特邀编委,也许是他向导正同志推荐的吧。我立即表示我当不了。老宋着急了,说,你看,你看,又见外了,你一直为《炎黄春秋》做的,已经是编委的事了。我还是坚决拒绝。可是不久后我的名字出现在“特邀编委”名单里了。老宋认定的事,他一定要做到,真拿他没办法。不过在我这方面倒也没有什么变化,仍是热心于史实字词的纠误。估计杂志社也许还存档了不少我写给老宋并转编辑部的纠误指谬信吧,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

老宋还经常要我为《炎黄春秋》写稿,这一点上我可是辜负了他的好心诚意了。翻翻旧刊,除了若干纠误短简和发言摘录,能勉强称为文章的平均年不到一篇,而我自己觉得尚可一阅的,不过《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和署名汪京的

《带到二十一世纪的应是什么?》、《“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等三五篇而已。其中《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曾受到舒展同志的赞赏;在《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一文里,我引用韩愈的《师说》,指出《炎黄春秋》传的是“实事求是”之道,授的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业,解的是恢复历史原貌之惑。这是得到老宋的肯定的。《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应是他最后读到的我的一篇拙文,其后即使再有,他也不会读到了,我也不可能再听到他的指正和鼓励了。

听说他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情绪平稳,精神坚强,自信可以度过此劫。以他的理想、志向和抱负,他肯定会想到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还有不少计划有待实现。然而天不假年,终于不可能了。这应是他难以忍受之重。其中最使他牵挂的,我估计应是《炎黄春秋》。他终于和《炎黄春秋》永别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哀哉!

(2004年6月7日)

(上接32页)右倾又发展到盲动主义的“左”倾,是由于共产党人“不懂得辩证法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是从哲学高度上对这三年党领导中国革命曲折历程经验教训深刻的理论思考。客观地运用“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这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论文在引了列宁的这个关于辩证法的精辟论点后,认为“列宁本人在其创造性的一生中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这种灵活性的种种光辉范例”,而我们正是缺乏这种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这里我们如果再联系他在1922年就在发表的文章中反对僵化地、绝对地看待真理,提出“科学的真精神是个人的思想自由”的话,那么通过莫斯科这一段学习,就更是进一步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武装。有了早期那样的思想基础和这一段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理论武装,也就可以了解为何继这篇论文之后不久,能写出上面所说的《论两条战线的斗争》那样体现辩证法思想的文章,同时也就不难了解后来为何是他,而不是王明,也不是博古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较早地起来纠正“左”的错误,为扭转中国革命的危局做出特殊贡献的问题了。

在许多当时莫斯科留过学的老人记忆中都 有一个所谓“四大教授”的流传说,张闻天即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为沈泽民、王稼祥、郭绍唐),1996年我们赴莫调查时确实看到了一份1930年国际列宁学校聘请的教职员名单,其中张闻天列为副教授第一名,教授的课程为“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土地革命的任务”,可见名非虚传。此外,还有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份国际土地问题研究所录用张闻天的档案,其中记载:“东方和殖民地部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月薪一百九十卢布。”从这两份档案,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教授、高级研究员这样的高级职称他已经获得,月薪190卢布当时也可算不薄,加上他当时已经同一位俄罗斯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有了这样的地位和生活。若按今天一些人们的眼光来看,满可以继续留在苏联呆下去,何况当时他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兼做着一些工作,然而早就决心“漂泊一生”的他,还是本着革命实践的需要,不惜抛弃这一切向国际申请回国,这样经批准于1931年1月离开莫斯科回国,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2004年5月19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 萧 徐)

彭老总巧语留人才

● 朱太刚 (口述) 朱东朝 (整理)

1950年,淮海战役刚结束,为组建炮兵队伍,组织上把我从前线部队调到沈阳高级炮校进修,学习炮兵课程。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正当我们第一期毕业的学员等待分配的时候,学校作出决定,凡成绩优异者一律留校任教员。由于建国之初,我军炮兵人才极度匮乏,留下优秀学员任教员是为日后给我军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炮兵人才。这一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

但学校的这一决定却在学员中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

原来,炮校的学员都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优秀指战员,而且大都在部队任有较高的职务,此次毕业后,如重返部队,职务和待遇都将得到提升,而如果留校任教,则所有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毫无疑问,从个人的前途出发,留校和回部队真可说是天壤之别。成绩优秀的学员则更加不平衡:为什么学习好的反而不如学习差的人了?

一时间,炮校大院里沸沸扬扬,很多人想不通,纷纷找到校领导,情绪激动地要求回部队。学校也感到工作十分棘手,不知如何做学员的思想工作。

这时,彭德怀同志风尘仆仆地从朝鲜战场上来到沈阳高级炮校,并很快了解了这一情况。彭老总非常重视,这是关系到我军发展建设的大事。

彭老总召集我们几个成绩优秀的学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穿一身整洁的旧军衣,军帽端正地戴在头上,连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面容上还看得出朝鲜战场的硝烟,神态严峻。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一时显得很平静,大家围着彭德怀同志坐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心想要挨一顿好批了。

彭老总神色和缓地环视了一下大家,闭口不提留校任教的事,更没有批评大家的意思。彭老总说:小时

候,在我家乡的山上有成群的野羊。那些野羊啊到处跑着吃草,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遍地都长着茂盛的野草,可是羊总是吃不饱,长得很瘦。原因是草多。它们东吃一口,西啃一口,总以为前面还有更多更好的草,结果跑来跑去的反而饿瘦了。到了冬天,草都干枯了,难得觅到一块能吃的草,羊就低着头认真地吃草,直到吃饱才离去。所以到了冬天,羊儿反而长肥了。

一段话讲完后,彭老总停顿了一下,话头一转,谈起留校任教的事:建设我军炮兵,发展我军炮兵,任重道远,是一项无比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你们干工作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你们都是解放军指战员,是革命军人,干工作要把个人利益抛开,不要讲求个人名利,要立足于本职工作,以革命需要为重。讲到这里,彭老总停下话头,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们,指指我说:“这个同志,你来说一下,你愿不愿意留校呀?”我站起来激动而坚定地回答:“我愿意留校!”在场的学员都纷纷站起来一致表示愿意留校任教,什么待遇,个人的升迁,早就被大家抛到脑后了,没有一个人提起,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为建设我军炮兵而奉献终生的豪情。后来,我们这一批学员分赴祖国各地,成为炮兵建设的中坚力量。

时至今日,虽然时光已经逝去半个世纪了,可那一天的情景犹如在眼前。彭老总的那一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决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从那一天起,我走上了炮兵教学的岗位,一干就是30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离休,我从没有离开过炮兵教学岗位。虽然现在我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无怨无悔。30多年来,我先后在沈阳炮校、郑州炮校、南京炮校工作。虽然在文革期间,军事院校也受到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我遭受了打击迫害,但为了彭老总的期待,为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我为我一生的付出感到欣慰和自豪。

(责任编辑 萧 徐)

一份内参推翻 “两个估计”

——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

● 余焕椿

(一)

“两个估计”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向灾难深渊，稍有不满意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

这“两个估计”是怎么出笼的呢？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4月15日开到7月31日，历时3个多月。会上，“四人帮”及其帮派人物抛出事先搜集好的所谓“材料”，把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说得一团漆黑，使会议始终形成一种大批判的紧张气氛：只许说17年坏话，不

许说17年半句好话。会议最后产生一份《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用以指导全国高等教育工作。这份《纪要》是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张春桥修改定稿发到全国的。

粉碎“四人帮”后，早对“两个估计”强烈不满的教育战线，纷纷起来要求教育部带头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1977年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大家希望揭开《纪要》内幕，推翻“两个估计”。会议主持者以《纪要》是毛泽东画了圈的，当中还引了毛泽东的一些话，阻挠揭批。这就引起与会代表的愤怒和不满，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表示对教育部领导的不满。



1977年，教育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批判“两个估计”，图为周培源（左）在发言

参加会议的穆扬、王惠平均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他们历来把尊重事实、说出真相看得高于一切，从不为“官禄德”、“名权利”所动，曲学阿世，写那些乱世惑众的东西。他们听取各方反映的意见，还特地在休息时间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开座谈会，调查、核实《纪要》和“两个估计”产生的详情。这样一来，会议主持者对

记者大为不满,认为记者在“煽风点火”“干扰会议大方向”,扬言要把记者“撵出会场”。

穆扬、王惠平没有屈服。尽管会议毫无建树,难作公开报道,但记者获得的材料已经得出一个结论:由“四人帮”炮制的《纪要》,尤其是其中的“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的一个“毒瘤”,教育革命要开创新局面,高校招生工作要搞好,非切除这个“毒瘤”不可。于是,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刊登在197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628期上,题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时候,正值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科技教育座谈会,对大家最关心的17年怎么估计问题讲了话,明确指出教育战线17年“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吹了一股推翻“两个估计”清新的风。

9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接见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又说:“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但当他看过“内参”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邓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他还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63、64页)邓小平支持舆论,《纪要》和“两个估计”就此一举被推翻,强加在教育战线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也同时被彻底打碎了。

“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以下简称《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二版头条还刊登了

“本报记者”文章《“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与《论战》相配合,成了当天轰动全国、振奋人心的大事。不仅教育战线,其他各条战线从中也看到了希望;“黑线专政”论的破产终将使他们获得解放。

事后,有人说《人民日报》一篇内参推翻了两个估计,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其实不是一篇,而是三篇。写《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前5天,王惠平、穆扬已经写了第一份内参,题为《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说他不敢站出来引导大家打碎“四人帮”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为推翻“两个估计”先造了一点舆论。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上,90多位全国著名的高校校长、党委书记,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现任部长很不得力,不宜继续担任教育部长,要求及早进行调整。为此,王惠平和另一位记者黄植写了第三份内参《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上的呼声》,提出“恢复高教部”,“派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有经验、有威望的同志担任教育部长”,“建议对现任部长及早进行调整”。不久,中央决定,教育部长易人。

(二)

《论战》是一篇激动人心又令人深感遗憾的檄文。在“两个凡是”阴霾笼罩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黑线专政论”还不能碰的时候《论战》的发表,无异是一声惊雷,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以及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起了巨大作用。不仅如此,对后来文艺黑线、新闻黑线、出版黑线、政法黑线、公交黑线……一一平反,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意义毋庸置疑。

但是《论战》一文虽然推翻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极力说明“两个估计”责任在“四人帮”,不在毛泽东同志,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四人帮”粉碎才一年,“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出于策略考虑,当时那样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6年过去了,多少事经过拨乱反正,是非已有定论,现在再来谈论“两个估计”,难道不应该与时俱进,把过去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貌?

2003年《炎黄春秋》第5期发表了原教育

部大批判组”吉伟青先生新作《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以下简称《前后》),不免令人失望。文章观点依旧,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原来大批判水平,没有从《论战》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前后》一文重点虽不再重申《论战》原来观点,而在回述当年写作《论战》的内情:一是定四条写作原则;二是说明那两段“极端重要的震撼人心的话”是乔木同志在审稿时加的,“使《论战》稿的政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这后一点恰恰在重申和加强原先《论战》的观点。

老实说《前后》并未贯彻那些写作原则。如果按“立论正确,是非严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事实为根据”去写,文章肯定要比现在有说服力。那两段“震撼人心的话”是《论战》的核心部分,现在又披露内情,无非是要增强话的分量和权威性,让人相信“两个估计”真的与毛泽东同志无关。殊不知这是玩忽历史,既不利于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极左思想作深刻的反思,也不利于对当代中国历史作准确真实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三)

胡乔木加的这两段话的原文是: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

文章一会儿说“指示精神”,一会儿说“指示”,语气极不肯定。原因是在中办和中央档案馆中都找不到原文。这种根据迟群、谢静宜等人笔记本上三言两语记录整理出来的文字,既不准确,也不可靠,却被用作《论战》的重要论据,难怪即便是胡乔木这样的权威也难以理直气壮了。

我相信毛主席同迟、谢等人有过这次谈话,但决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谈,打招呼,劝他们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仅此而已。用它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的,恐怕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系列讲话,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

5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愈来愈重要,党同知识分子之间某些不和谐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还批评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以及使用和待遇上的不合理,提出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这次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

1957年夏,毛泽东把鼓励发展科学和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广到政治领域,实行“大鸣大放”,“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但是,等到各种意见出来了,既批评共产党,也批评

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情不妙,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假的”。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派斗争;“双百方针”受到严重干扰,55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此后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被整得抬不起头,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党和知识分子关系又趋紧张。为缓和矛盾,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赴广州,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又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再次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

陈毅还在会上宣布“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他甚至说,8年、10年、12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广州会议再次燃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使他们看到新的希望。但好景不长,1963年底,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两次严厉批示,使他们希望破灭。一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一次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批“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两次批示,不仅夸大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而且为文艺界进行“左”的批判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文艺界从上到下,据此开展整风,进行检查。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许多文艺界代表人

物,都遭到错误批判。这种批判很快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领域,杨献珍、孙治方、翦伯赞、吴晗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无一幸免。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掀起政治大批判运动,把大量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意见统统列入“右派言论”,借此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后来发展到批判北京市委,批判中宣部,批判正确指导开展学术活动的《二月提纲》(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燃起“文化大革命”的大火。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无端地捏造出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说“新中国建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从此,“黑线专政论”肆虐全国,知识界受害惨重。这个《纪要》正是毛泽东修改并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学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通知》将“左”的思想推到了顶点。

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视知识如粪土,将英才俊彦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排在各类坏分子之后……在那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的尊严,抗击邪恶势力对人的摧残。每当想起这些,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疾首。面对这一切,我们还能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泽东无关吗?《论战》承认“文革”17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却又说这与毛泽东无关,是说不过去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西路军问题与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 马长虹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经过10年砥砺写成的一部有很大影响、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当年却因为西路军问题而在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

关于西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础之上编修而成、并于2002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是这样描述的: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一环。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西渡黄河的2.18万红军(占当时全国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

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先念当时是红三十军政委。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三个游击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经过33天的艰苦卓绝的跋涉越过祁连山,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

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张国焘终于在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特务。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讲了这样一番话。毛泽东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1951年10月北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这篇文章成文于1936年12月,文中写道: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在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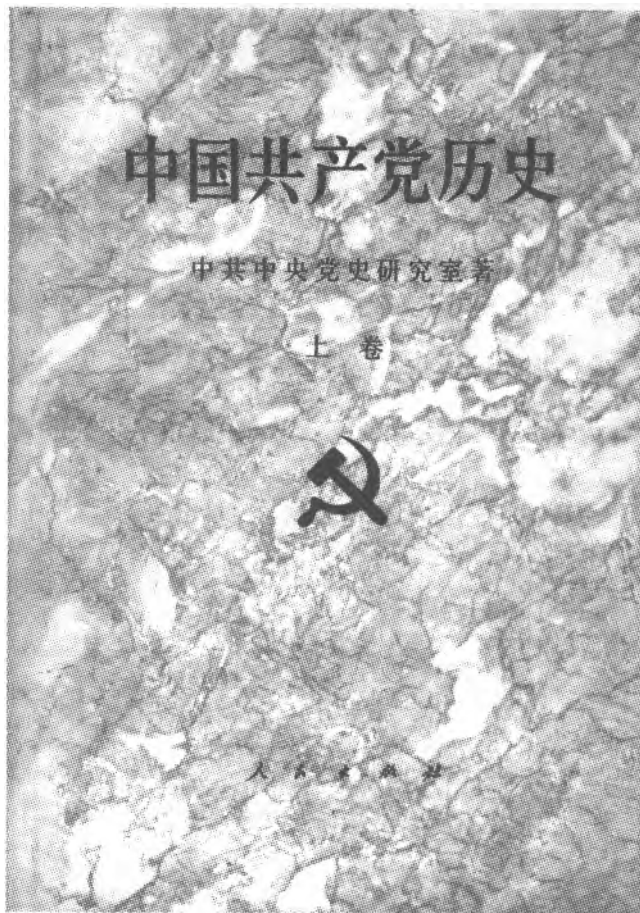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委托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西路军历史档案。根据大量历史事实,李先念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报告中央。说明中这样写道:“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对于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分别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根据中央精神,此后关于西路军的表述和评论有了崭新的面貌。其中包括对《毛泽东选集》注解的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上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注释这样写道: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恰逢此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但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卷)》出版还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便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愤怒的心情,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来自国家主席的愤怒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得到了修改。人民出版社把此时已经装订完毕等待发行的7万本成书中的相关书页全部撕去,再粘上修改后的书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此后累积印数达30万册,书中有关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已经得到了改正(如下所引,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0月11日,它们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作好渡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对重点击破南线敌人没有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异议。

李先念所痛斥的《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指的是1991年第一期《新华文摘》转载的《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一文。文中对“近十年来,党史学界对红

军西路军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即：“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新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加以否定，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断章取义地分析，无视徐向前元帅1984年7月即出版了的自传《历史的回顾》大量有关西路军的回忆，轻率地得出了“河西部队从组成西路军到西征，均不是出自于中央的战略部署”、“张国焘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西路军西出凉州，兵发新疆的决定出自于西路军自己，而不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等等一系列学术结论。

在此只举一例即可窥探该文断章取义的程度。该文中提到了1936年10月中央军委拟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对红四方面军的具体部署（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前略）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后略）

通过以上引文可以看到四方面军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阻挡南面敌人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进攻宁夏。据此，第三十军奉命

到靖远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鉴于四方面军现有造船力量及材料不足，毛泽东通知彭德怀，令一方面军火速收集造船材料，寻找技工，送往三十军。10月24日夜，三十军按照中央电令在河包口（虎豹口）渡河成功。26日，中央电令九军渡河。29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后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改变原令，命已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这时，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由于南线敌人突进靖远，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到河西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完全按照预想方案行事。五军被迫西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从军事上说，时任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朱德、张国焘依据当时的敌情变化，果断处置，令五军过河，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知，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按照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动的。

但是《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却作了断章取义的处理。该文只引用了上述《十月份作战纲领》引文中的黑体字部分，并据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看，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之主力部队的任务应是南下防御，尔后参加宁夏战役。”试问不渡河那“加速努力造船”做什么？试问没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那发动宁夏战役做什么？当时接通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占领宁夏，通过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的外蒙与苏联靠近；一条是通过新疆与苏联靠近。该文对这样的基本史实都加以否定，难怪李先念要对其大加斥责。

政治是多变的，历史是人写的。也许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人们有着今人无法理解的无奈，但是作为今天的史学研究者，秉笔直书应是自己的义务，为后人留下民族真实的记忆更是自己的责任。把能写的和该写的按它本来的面目写出来，应当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责任编辑 萧 徐）

蒋斌将军蒙难记

● 王书君

蒋斌,字及时,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福建长乐县古槐乡屿头村人。蒋斌将军是在上世纪初叶,在中国改朝换代、由封建帝制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型之际,毅然选择了追随孙中山,从而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的爱国志士。

1923年,一直赞同、支持孙中山革命主张的蒋斌,由海军转入陆军,到保定军官学校,入步科六期七连,就读交通和通讯专业。保定军校毕业后,蒋斌便北上到了东北,以期在奉系集团里得到发展,为国出力。在奉军中历任连长、营长、交通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总监,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2年8月,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时,蒋斌任北平军分会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电报局局长兼军犬信鸽训练所所长等要职,协助张学良做了大量工作。

“西安事变”后遇难真相

1934年10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任命蒋斌为“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专负西北方面的有线无线通讯,并兼任西安市电信局局长和无线电台总台长,蒋斌由此晋升为中将。

当年的交通处,类似今日之后勤部,部门重要,责任重大,其中,不仅掌管军队的电讯,且地方电讯以及交通运输也在其统管之下,因而,此职位非张学良所信得过的人莫属。

当时,张学良虽身为“剿匪司令”想的却是“抗日还乡”,他秘密与共产党联系,进而在肤施(即延安)与周恩来“坐谈竟夜”。随后,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斌任东北军电台总台长时摄于沈阳

蒋斌在张学良的器重和信任下,全程参与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在事变的前夜,张学良亲率十一员亲信高级将领前往新城大楼与杨虎城汇合,坐镇指挥,蒋斌即是张将军亲自指定的参加者之一。

追随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走联共抗日救国的道路,是蒋斌一生中第三次大转折。

事变后,蒋斌在“三位一体”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中出任交通委员会主任,张学良把主控电讯及交通运输方面的重任交给了他,蒋斌临危受命,豪气凛然,呕心沥血,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据东北耆老高崇民之子、当时在东北军中工作、后曾任中共炮兵副司令员的高存信书面回忆说:“去新城

的高级将领人数不多,都是张的亲信。开始,让蒋斌发的第一封电报,是给洛阳炮六旅旅长黄永安,黄于十二日凌晨即收到电报。”

《张学良年谱》一书记载十四天的西安事变各方的来往电讯电文,竟达一百余页,可见蒋斌担纲的电讯电台任务之繁忙。

据事变参与者之一、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后出任中共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书面回忆说,张学良把蒋斌叫到设在新城大楼的临时指挥所,“让他掌握电台,主持向南京、延安及各方面拍发电报,这些电报对方都已按时收到,并收到复电。”

不管你对西安事变是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但你都承认,由蒋斌担纲的电讯部门,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安危存亡之际,以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向政府各部门、向各党派、各团体、各有关将领、向世界各国发出了有关事变的主旨和真相的大量电文电讯,从而为随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促成联共抗日、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提供了前提条件。

毋庸置疑,蒋斌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是不容抹杀的。

事变后,张学良独闯南京,负荆请罪;而蒋介石则以武力相胁,大兵压境,迫西安方面就范,编遣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形势十分险恶,内战一触即发。

战乎?和乎?被软禁在南京孔祥熙公馆中的张学良忧心忡忡。在他抵达溪口当晚,疾书杨虎城等诸将说:“盼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很明显,此刻,张学良以抗日大业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力避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兵戎相见。正如他晚年对唐德刚教授所讲的那样:“我是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是为了什么?我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再打内战了。”

这时,西安方面,西北军中分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杨虎城左右为难,一度动摇于和战之间。

中共的方针,仍是继续逼蒋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反对纠纷,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

而东北军内部两派意见则尖锐对立: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以及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应以张学良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一致对外,认为一切都应从大局考虑,反对贸然开战,并愿意接受和谈条件,从潼关撤兵;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等人为首的

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少壮派”,则坚决主张南京必须先放张学良回陕,然后东北军才可以撤兵,否则便与中央军拼个你死我活。

王以哲为了说服少壮派放弃动武念头,统一东北军内部思想,于1月29日在渭南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不期,王因病未能参加,只好委托总部参谋长董英斌主持,会议最后决定: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攻,则决心与其决一死战。

很显然,这个决议是违背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以及蒋斌等将领“主和”意图的,这时,东北军内部战与和的争执愈演愈烈,两派剑拔弩张,几近势不两立。

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主和,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随后,西安方面首先下达了撤兵令。

在此情况下,东北军少壮派中少数极端分子决心铤而走险,密谋大开杀戒,夺取东北军指挥权,阻止撤兵。他们采取的手段竟是残忍的暗杀。于是一份拟处决者的名单很快开列出来: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蒋斌、徐方,谢诃等十余人。

关于蒋斌的惨死,其嫡孙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先祖孙三七年元月三十一日,孙铭九以何柱国先生名义通知其开会,结果一去就不复返了,根本不知被关在何处,交通处的同仁也找不着他。二月二日清晨,孙铭九派人来找我祖母,要十万大洋,并扬言交款可以放人。当时兵荒马乱,祖母是随军眷属,何来此巨款?我父亲当时尚年幼。不久,就传来祖父被杀的消息。先祖被杀时所穿的军服(血衣),我祖母一直保存到文革被抄家时才丢失。”

原来,在会议散会之际,蒋斌被孙铭九一伙挟持到汽车里劫走,先藏在城内,后又被关闭在卫队营驻地的西安东城门楼上的一间小屋内。

2月2日上午,孙铭九派人杀害了王以哲、徐方、宋学礼等人后,又来到东城门楼上,亲手从小屋中把蒋斌拖出来,欲实施枪杀。据目击者说,蒋斌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当面痛斥孙铭九是野心分子,痛斥他发动暴乱的野蛮行径,孙铭九闻言恼羞成怒,疯狂地向蒋斌嘴上连开数枪,打碎了他满口牙齿,接着,面对不屈的蒋斌,孙又残暴地向他的胸膛近距离开火。更令人发指的是,当蒋斌尚在弥留之际,孙铭九就丧心病狂地下令将他埋

在离小屋仅十几米远的城墙脚下。

郭维城曾撰文证实道：“东北军内部少数野心家妄图篡夺领导权，组织新东北军，蒋斌拒不与他们合作，坚决按张学良手令办，追随于学忠、王以哲为首的正确领导，拥护‘三位一体’，实现和平政策，少壮派为了夺权，首先就要夺电台之权，为此，蒋斌被少壮派头头应得田、孙铭九私自逮捕，扣压在卫队二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和王以哲一起被枪杀。”

惨案中，何柱国将军因及时躲逃到杨虎城公馆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唯王以哲和蒋斌军阶最高，均为陆军中将。

血案发生后，杨虎城签发了一道逮捕应、孙、苗和其他一些暴乱分子的通缉令，以便稳定军心，挽救西安摇摇欲坠的局面。主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见大事不妙，连夜逃离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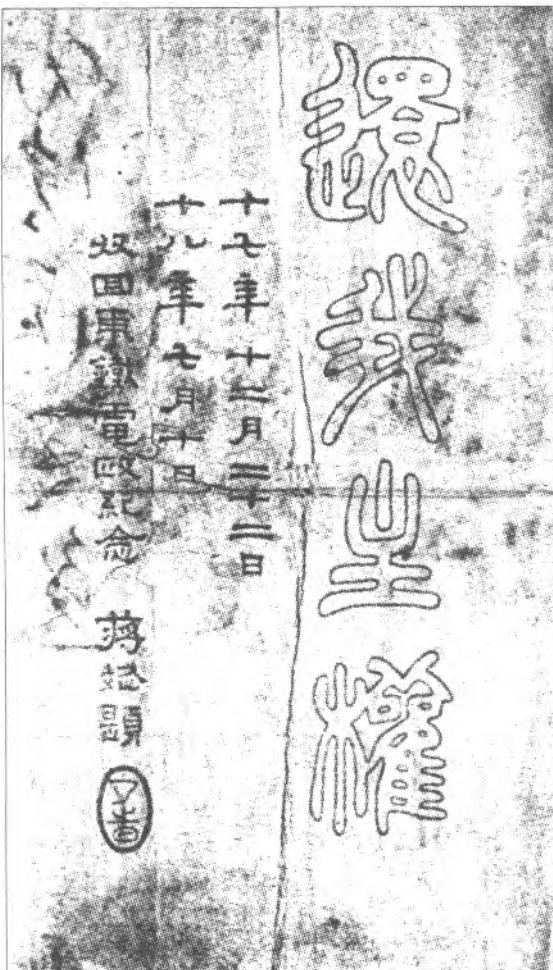
张学良对“二二暴乱”完全是持否定态度的，对王以哲、蒋斌等得力将领惨遭毒手痛心疾首，他愤怒地对吴克仁军长说：“这些暴徒能够捉住正法顶好！”

灵柩北运 隆重公祭

王以哲、蒋斌等将军遇难后，遗体运往北平，其公祭详情，1937年2月22日出版的《世界日报》和《北平晨报》均有详尽报道：

“西安二月二日暴动事件遭难之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灵柩，于十八日由西安专车东运，经过郑州、顺德等地，沿途在各站受各界人士及各亲友吊祭，昨晨七时十分继续北开，经过长辛店、西便门等站，均略停，十二时三十分开抵前门西车站。冀察政委会、绥靖公署、北平宪兵司令部合组之治丧处，首在站前致祭，祭毕，各灵柩分别移赴柏林寺及法源寺安厝，定期开吊。”

“祭棚布置，治丧处事前特在西车站北侧支搭祭棚



蒋斌手书“还我主权”

一座，为三灵柩出站后公祭之所，布置极为整洁肃穆，前面扎有素形牌坊，棚内节为三间，分置三氏灵位。各间摆设均同，每间设一案，上置供品，及祭品三色，墙间满悬挽联、横匾、花圈等件。不下千余件。”

“与祭人员，昨午十一时许，各界人士及王蒋宋等之亲友，纷纷莅临，准备与祭，治丧处在场设桌办公，来宾到后首先签到，当即发给素花一枝，计到各界名流有万福麟、宋哲元代表刘哲、鲍文樾、高胜岳、鲁穆庭、叶弼亮、陈继淹、钱宗超、邹致权、张振鹭、张建侯、姚东藩。保安队、警察均到站戒备，维持秩序。”

“灵车抵站，十二时三十分，灵车进站，由宪兵司令部乐队奏哀乐，各界来宾，及眷属陆续进站。运灵专车一列，共分十余节，王以哲灵车在首，系铁闷车，外罩白布，上书‘王故军长

鼎方之灵车’；宋学礼灵车置于当中；蒋斌灵车列为最末；各眷属同来。车停后，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宋哲元代表刘哲等，首先入内致祭，行三鞠躬礼，万、刘下车时，均已满面泪痕，状殊悲痛。”

“致祭情形，万等在车上祭毕，即退出站外，准备正式致祭。三氏灵柩旋即徐徐移出站，转入祭棚暂停。王以哲灵柩置于正中，蒋斌灵柩在右，宋学礼灵柩在左，各氏家属亦随之扶灵柩走入，分别跪于各灵柩之旁。一时整，各事均布置就绪，当即开始致祭，首祭王，次祭蒋，再次祭宋，均由万福麟主祭，刘哲陪祭。礼节简单而肃穆。”

“安厝地点，三灵柩受各界致祭毕，即分别移赴指定地点安厝，计：（一）王以哲灵柩出站后，经公安街长安街直赴安定门内柏林寺安厝。（二）蒋斌灵柩经过长安街、王府井大街，二时许至锡拉胡同蒋之私寓门前略停，举行家祭，旋即继续前行，经东华门转长安街出宣武门至法源寺安厝。（三）宋学礼灵柩出站后，即直接运往法源寺安厝。”

“各氏眷属 三氏眷属昨日均同车扶灵柩来平,王氏享年四十一岁,遗有两子、两女,长子育斌,次子育文,长女育馨,次女育贞。蒋氏享年四十七岁,遗有一子二女,子名馨生,年十六岁,女年尚幼,其妻蒋石钟奇亦同来。宋氏享年四十二岁,仅遗一子,名强,年二十一岁。此次三氏遭难,身后颇为萧条,中央决定拨款抚恤,俟规定数目后,即可发表。”

显而易见,当年,对于王以哲、蒋斌等诸将领不幸被害,上至当局,下至民众,皆给予隆重悼念,致以崇高敬意。

死后仍背负罪名

然而,应德田、孙铭九等暴乱凶手,为掩盖其滥杀无辜之罪行,杀人之前就以“除奸”为名,捏造事实,罗织罪名,造谣诬蔑,制造了这一冤案。

更有甚者,上世纪80年代,应得田又写了一本《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书中再次对蒋斌进行了诬陷,说什么:“这天夜里(指西安事变的前夜),交通处长蒋斌也到这里来了,张学良将军很不放心蒋斌,嘱咐我仔细留心他的行动,不要让他走开。”同时,书中又无中生有地说什么蒋斌“勾结南京,迟发了八大主张电报”。

应得田这一为掩盖其滥杀革命志士的罪行而编造的谎言,实在是漏洞百出,不值一驳。

首先,蒋斌是自上世纪20年代始,尚在东北时期就追随张学良的爱国志士,是张的亲信,并屡屡被委以重任,正如张将军多次对唐德刚教授所表述的那样:“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要用你,我就相信你,就放心地让你去做!”

张将军一贯用人行事的风格就是这样,哪里会有在事变前夜的重大关头,特派小小的应得田去监视自己亲自委以重任的“中将亲信”这等咄咄怪事?

其次,西安事变前夜,张学良亲率十一员高级将领前往新城大楼与杨虎城汇合,建立事变指挥中心,这些人都是张学良亲信中的精英,如果张学良那时不信任蒋斌,怎么会亲自指定蒋斌也参加到这拥有重大权力和机密的指挥中枢来呢?可见,应得田的谎言是自相矛盾的,难以自圆其说的。

而事实上,如前所述,事变当天,张、杨拟定的“八项主张”通电,九时发出,南京方面十时就有反应。而且,据《年谱》记载:“南京政府要员,于当夜十二时,召开紧急临时会议,会议延续到十三日凌晨三时。”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十二月十二日即下达了对张学良的撤职令,足以证明通电并未扣压。西安事变的主要目标是南京政府,南京方面当日就已收到,对其它地方,还有什么积压扣发的必要呢?

显然,所有这一切谎言,纯系应德田假借张学良的名义诬陷蒋斌,因为应得田知道,张将军被囚禁,蒋斌已遭毒手,死活皆无法对证,信口胡说,谁能奈何得我?同时,这也是应德田之流逃避滥杀无辜之罪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无独有偶,西安事变五十年后,又跳出来一个叫岳崇的人,写了一篇《蒋斌扣发西安事变通电前后》的短文,文中说:“当双十二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湘、刘文辉、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孙连仲等以及驻在保定的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的急电,蒋斌都擅自扣压不发。”

可是,岳崇又在此文中自相矛盾地说:“总部送我去南京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学习,当双十二事变第二天,友人郑公权来到我家,行色仓皇,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上登着大字标题《张学良(良)劫持统帅》、《蒋委员长在西安被扣》、《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等,当时我感到惊奇。”

岳崇一面说电报“蒋斌都擅自扣压不发”,一面又说在事变的第二天,他在南京就看到报上登出了《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等,这不是自打嘴巴吗?这不是恰恰证明西安方面及时发出了“八大主张的通电”?

更可笑的是,岳文中还无中生有地说:“蒋骥是他弟弟,管理铁路军运。”可是,据蒋斌嫡孙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他的文章中说我祖父有个弟弟,实际上,我祖父几代单传,而且到祖父这一代也是几房才有一个男的。我父亲也是独子,到我这一代才有哥哥和我,我和哥哥又各有一子,他文章中说的那人,我们家庭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可见,自相矛盾、道听途说的岳文,哪有什么可信度?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据我姨婆回忆,岳崇是我祖父手下的一个尉官,平时不务正业,西安事变之前早已在南京学习,整个西安事变全过程,他根本没有参加,何来诬蔑先祖的言词呢?”

郭维城曾书面证实道:“蒋斌的罪名是私通南京政府,扣发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这完全是陷害诬蔑。蒋确未扣发电报,而且,所有这些电报都是密码的,都是先经机要部门秘书起草,张学良签字,再由机要部门

译电员译成密码后,由收发电台拍发,蒋斌和电台根本不知道电报内容,也无从扣起。来的密码电报也是由电台收到后,送机要部门译电员译出,由机要秘书分别送领导阅批,蒋斌和电台不知道内容。”

这里,郭老又从专业技术和工作程序的角度,一再强调,当时,任何人是无法扣发或擅发电报的。

在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以及《西安事变电文选》中,我们从南京中央驻洛办事处在事变期间发给南京政府的八十封密电中来看,也未能找到任何一个字,能证明蒋斌在西安事变期间与南京“秘密勾结”。

高存信在书面证明信中写道:“若干电报和回忆录中,都没有蒋斌与南京勾结的材料,可见说‘勾结南京’纯属为陷害蒋斌而制造的杀人借口,现在有不少人在重复这个问题,其实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当时制造的谎言。”

更有甚者,孙铭九、应德田行凶之后,为了进一步掩盖杀人罪行,又诬蔑蒋斌是“军统特务”、“军统潜伏特务”、“出卖副司令”,甚至还离奇地编造说:“张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然而,事后又推卸罪责,说枪毙蒋斌是“大家说的”。

孙铭九的同伙、时任西北军军法处长的米暂沉,直到1986年还借出版《杨虎城传》之机,在书中诬陷说:“西安事变证明,剿总交通处长蒋斌和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长黄念堂都是军统特务。蒋斌积压了事变对外通电,黄念堂在事变前刹那,走漏了消息。”

然而,众所周知,军统成立于1938年4月,而蒋斌、黄念堂则于1937年2月2日便已遇难,可见,造谣者的伎俩也实在太拙劣了。

蒋斌惨遭杀害,至今已六十六年了。为了告慰“二二暴乱”中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洗雪诬蔑陷害不实之词,还遇难者以历史清白,给以正确的历史评价,文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许多当年与蒋斌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出面替蒋斌作证,他们分别是原任张学良机要秘书、曾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东北老前辈知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之子、解放军炮兵副司令高存信,白竟凡女士等,以及众多当事人。

郭维城证实道:“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和王以哲一起被杀,罪名是蒋斌私通南京政府,扣押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还说他是特务,这完全是诬蔑。”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公布的材料,没有一件能对此作出说

明,诬陷者更是拿不出一件事实来证明。西安事变前我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事变后我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曾经与蒋斌一起办公,我可以证明蒋斌被害,是野心分子对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高存信的夫人白竟凡亦撰文写道:“我本人为了考证蒋斌的政治情况,为慎重起见,亲自向我们国家的公安部门,提出要求对蒋斌进行是不是‘军统和中统特务’及‘十人团’、‘复兴团’等反动组织成员的查证,公安部查阅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特务名单,查证结果是:‘经查无此人材料’。”

1988年4月,蒋桢先生亲自来到米暂沉家中,当面质问他:“军统成立于1938年4月,蒋斌却早已于1937年2月被害死,为什么你出书还诬指他是‘军统特务’?”

米暂沉当面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表示内疚,并说要在《团结报》上公开赔礼道歉,以此骗走了青年人,但后来至死他也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

蒋桢先生在信中还对我说:“文革时,我还去上海市参议会找孙铭九,可他一直躲着我,不敢见。”

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先祖的问题,我此次专门去台湾查询有关资料,……我去了台北忠烈祠,不见其牌位,抚恤档案也没有。在忠烈祠左边的祠堂里只见到在‘剿匪时期’一栏中有徐方之名(“西北剿总”参谋长与先祖同时遇难),也不见王以哲、宋学礼等将军的名位。当然,王以哲大陆已经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台湾当然不可能以他为忠烈了。但我祖父呢?一些人说他‘勾结南京中央,投靠何应钦将军’,如果果真如此,他则是忠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当然可以名列忠烈祠,可是里面没有先祖。可见一些人的污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了。”

高存信在证明信中认为:“经过五十多年的实际考验和我的研究,证明蒋斌是个爱国志士,而被无辜杀害的,现在应该实事求是追认为烈士。”

郭维城在证明信中也说:“我可负责证明蒋斌被害是野心分子对于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可以这样说,蒋斌将军既是一位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为国牺牲的民族英雄,同时又是一位至今仍被诬陷栽赃的爱国志士。据悉,大陆有关部门最近正在调查落实,着手为蒋斌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我在海外闻此,深感快慰! (责任编辑 萧 徐)

杨子荣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形象通过《林海雪原》的小说、电影、特别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为人们所熟悉。不过,大家认识的杨子荣是小说、电影和舞台上塑造的形象,对现实生活中的杨子荣——当年在东北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的特级侦察英雄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而最近上演的有关杨子荣的电视剧,对杨子荣的形象更作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虚构,不仅损害了英雄的形象,也为大多数观众所不能接受。杨子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牺牲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很多人都想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

一、杨子荣是山东牟平人,曾在东北闯荡生活了14年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城南一个叫嵎峡河的小山村。父亲杨世恩是个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个刚强的农村妇女。杨子荣4岁那年,父母曾带着一家老老去东北安东(今辽宁丹东)谋生。但父母一天到晚拼死拼活地干,也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没办法,除了父亲和姐姐外,母亲又领着其他孩子回了老家。在老家,母亲省吃俭用地供杨子荣上了几年私塾。

1929年,胶东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2岁的杨子荣在母亲的安排下,去安东投靠父亲。开始父亲让他去上学。两年后,杨子荣到姐姐做工的缫丝厂干活,以挣钱补贴家用。但是好景不长。杨子荣三年学徒期刚满,厂子裁人,杨子荣被赶出工厂大门。无奈之下,杨子荣就到码头搬木头、扛大包,到鸭绿江江边放木排、当船工。1938年底,他在鞍山千山采矿区找了一份当采矿工的活儿。矿区的活儿也不是好干的,不仅有生命危险,还要常常忍受日本监工的打骂。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看到日

杨子荣的真人真事

● 王荣卫

本监工毒打自己的工友。一次,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夺过监工的皮鞭,为自己的工友出了气,但他自己也无法在矿山呆下去了,在工友的帮助下,杨子荣逃离了矿山,回到了老家牟平。这一年是1943年春,杨子荣26岁。

从12岁离家算起,杨子荣在东北整整闯荡了14年。这14年,对杨子荣来说,可谓是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体会了生活的艰难辛劳。但也使他熟悉了东北的风土人情、山情地貌,结交了一大帮穷苦朋友,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段经历,在他后来参加的剿匪斗争中,可谓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在家乡报名参军,随后开赴东北剿匪

杨子荣回家后,正是家乡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他毅然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积极配合正规部队,打击日伪军。

母亲也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媳妇是邵家沟一位叫许万亮的姑娘。婚后不久,女儿出世了。女儿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不少的欢乐,而半年后,女儿的天折,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忧伤和痛苦。

1945年9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为应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山东立即派主力部队开赴东北,解放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了十几年的东三省。为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杨子荣所在的胶东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参军活动,每个县、乡、村都有参军任务,杨子荣的村也不例外。

杨子荣小时候最爱看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他对书里的英雄人物十分敬佩,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英雄。当他得知村里组织报名参军的消息后,没等跟家里人商量,就报上了名。不过报名时没用“杨宗贵”,而是用的“杨

子荣”的名字。

参军后,杨子荣被编在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因为岁数大,被安排到炊事班当了一名炊事员。杨子荣虽说不是太情愿,但既然当了兵,就得听从领导的安排。

根据上级指示,杨子荣所在部队经过短暂集训后,于11月下旬开赴龙口。接着从龙口港坐船,开赴东北。部队在辽宁庄河登陆,改番号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随后,继续向北挺进。一路上,一边行军,一边打仗,先后解放了吉北哈南一带的乌拉街、朝阳、舒兰、榆树、五常等城镇,于1946年2月初到达黑龙江省东部的牡丹江地区,驻扎在牡丹江市西边的海林镇。

在进军途中,杨子荣还积极响应部队的号召,每到一个地方,就利用向老乡筹粮、借锅灶等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人民军队的性质,发动青年参军参战。一路上,杨子荣一人就动员了30多人参军,被部队评为“扩军模范”。

1946年1月,杨子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旗下庄严地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三、在杏树底剿匪战斗中,一人劝降400土匪

根据上级指示,杨子荣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牡丹江地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土匪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部队进驻海林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战斗。第一阶段,采取集中兵力、分路清剿的办法,先后歼灭了势力最强、威胁最大的郑云峰、马喜山、谢文东等部大股土匪。

看着战友们在前线与敌人拼杀,把杨子荣急坏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趁着往阵地送饭的时候,也拿起枪与战友们一起参加战斗,有时还帮着出出主意、支支招儿。在一次战斗中,一班长负了重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一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没有个好班长可不行。正当连长为班长的人选犯愁时,指导员一句“你看杨子荣怎么样”,把连长给提醒了。就这样,杨子荣众望所归,当上了一班班长,也遂了自己的心愿。

担任一班班长的杨子荣,如鱼得水,在随后的

剿匪战斗中,表现得异常机智勇敢,特别是在杏树底剿匪战斗中,孤身一人,闯入敌阵,硬是把400多土匪给劝降了,堪称剿匪战斗的一个奇迹。

杏树底村是位于牡丹江北部的一个山村,这里集结了从各处逃窜来的土匪400多人,他们凭借村子的有利地形和村周围高大的土墙、坚固的工事,与我剿匪部队对峙,企图负隅顽抗。3月22日,攻打杏树底残匪的战斗打响,杨子荣带领尖刀班冲在最前面。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援。几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也隐约听到村子里妇女小孩的哭喊。如果再打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掉,但村里的老百姓也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一个箭步从沟里钻出来,就挥舞着白毛巾,直奔村里,去劝降土匪。

在杨子荣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土匪开始动摇,村里的群众也纷纷劝说土匪赶快投降,别让乡亲们也跟着遭殃。这时,几个土匪头目出来了。为首的分别是青背村、北甸子逃来的残匪许大虎、王洪宾,和家住本村的郭春富、康祥斌。许、王二人色厉内荏,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郭、康二人因家在本村,不能不顾村里乡亲们的死活,经杨子荣和乡亲们的一番劝说,有了投降的意思。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终,还是郭、康人多势众,占了上峰。杨子荣乘机做工作,土匪们纷纷把枪扔到杨子荣的身边。许、王看看大势已去,也垂头丧气地把枪扔到了地上。就这样,一场血战被杨子荣的勇敢举动化解了。

杨子荣一人劝降400土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部队,部队首长决定让杨子荣到团里做侦察工作,并担任团侦察班班长。杨子荣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此后,在每次的剿匪战斗中,都是先由杨子荣率领侦察员,乔装打扮,深入侦察,待摸清敌人的详细情况后,再由大部队进行围剿。

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剿匪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杨子荣也由侦察班长升任侦察排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四、智擒“座山雕”的经过

经过近一年的剿匪战斗,大股土匪已基本被

消灭,但二三十人一伙的小股土匪仍有不少,而且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外号叫“座山雕”的土匪就是其中之一。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原籍山东昌潍,两岁时随堂兄到牡丹江,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历经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此人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在匪徒中颇有声望,内部人称“三爷”。当年,张作霖和日军都曾想消灭他,但都没成。日本投降后,他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我剿匪部队进驻牡丹江地区后,曾对这股土匪进行多次围剿,消灭了他的大部分人马,只剩下身边二三十个亲信死党,隐蔽在深山老林里,一心等着国民党大军到来。并时常出没山林,抢掠百姓,杀我干部,继续作恶。

按照以往的经验,对这种小股土匪,用大部队围剿是行不通的。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待机剿灭。同时,派出部队跟踪配合。

1947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

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是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遇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了腔,答应领他们去一个地方。他先从屋里拿出一把锯、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交给杨子荣等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了20里外的一个空木棚子,交待了几句后就走了。

杨子荣他们在工棚里一连等了两三天,也不见孟工头的影儿,仅有的一点儿苞米面也吃完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担心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正在着急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这回他把杨子荣一个人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在屯长家里见了两个人。两人先是一番土匪黑话试探,见杨子荣对答如流,才亮出了真实身份。一位自称姓刘,是“座山雕”的副官,另一位被称为连长,两人表示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并说要下山办些酒肉,

准备在山上过元宵节,等禀报“三爷”后,再来接他们上山入伙。

两天后,两人如约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战士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了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确实真够狡猾的,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当初要是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了哪一道哨卡,土匪都能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由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岗哨也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三道哨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做“马架房子”的木棚。

杨子荣命令三个战士在外面看好土匪,他带领另外两个战士冲进棚子,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远扬的“座山雕”。杨子荣命令战士把“座山雕”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绑了。

这次剿匪可谓大获全胜,没费一枪一弹,端了土匪的老窝,活捉了阴险狡猾的“座山雕”和土匪13人。

杨子荣活捉“座山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海林镇,当地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进行了报道,称这次剿匪战斗“以少胜多创造范例”。团里也召开庆功大会,给杨子荣记功,给其他战士也分别记了功。

五、血洒海林,英雄罹难

消灭了“座山雕”,剿匪工作并没有结束。2月20日,也就是活捉“座山雕”的第13天,杨子荣又领了新的任务,踏上了新的剿匪征程,这次是负责清剿在海林北部梨树沟一带活动的漏网残匪。为保险起见,团里决定,由副政委曲波带领30人的小分队,随杨子荣一起进山。

经过几天的侦察,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在一个叫闹枝沟的地方,发现了土匪窝藏的地点——一座冒着炊烟的“马架房子”。为了不惊动土匪,在离窝棚三四百米的地方,杨子荣命令侦察员们

匍匐前进,慢慢向窝棚靠近。在确定土匪没有发现以后,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一齐向房内猛扑过去,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慌乱中有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匣枪扳机,可能是天气太冷,枪针受冻,枪没有打响,其他战士也立即向屋内射击,也没有打响。这时,从屋里射出一颗子弹,正好打中杨子荣的胸膛,杨子荣晃了几晃,便倒了下去。

听到枪声,随后赶到的小分队,在曲波的指挥下,立即向土匪的窝棚猛烈扫射。土匪在房内也拼命顽抗,向外射击。曲波命令战士爬上房顶,向屋内扔手榴弹,终于把这股顽匪全部消灭。

土匪消灭了,但英雄杨子荣却倒下了,小分队的同志为失去这位英雄的排长、昔日的战友而失声痛哭,纷纷脱帽向英雄致敬。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是1947年2月23日。

杨子荣牺牲时年仅30岁,参军只有一年多时间。从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他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多次立功受奖,并被评为战斗模范。

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位英雄,学习这位英雄,3月17日,杨子荣所在部队在海林镇朝鲜族小学操场上,为杨子荣和其他几位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授予杨子荣“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将杨子荣生前所在排命名为“杨子荣侦察排”。

六、英雄的身后事

杨子荣参军后,就随部队去东北参加了紧张的剿匪战斗,一直没时间给家里写信。家里只知道杨子荣参加了八路军,也不知道到哪去打仗了,更不知道他在部队成了战斗英雄,并且光荣牺牲了,也不知道他用了杨子荣的名字。相反,杨子荣在东北经常化装侦察,扮成土匪的模样,倒给家里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原来,村里一个从东北回来的人,说在牡丹江看到过杨子荣,说他一身土匪打扮,八成是当了土匪了。村里为此取消了杨子荣家的军属待遇,也不再给他家代耕了。杨子荣的母亲宋学芝听说后,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就找村里干部评理。村干部说,人家都看见了还能有假?宋学芝不服,就背上干粮,到区上、到县上、到地区找,终

于在1957年1月等来了一张“失踪军人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经审查确认杨宗贵同志为失踪军人,家属仍享受革命军人家属的优待”。1958年11月,政府又根据有关规定,给杨子荣家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看着证书,宋学芝失声痛哭,她哭自己失去的儿子,哭自己终于为儿子洗去了不白之冤。

1966年,宋学芝去世。老人到死也不知道,她天天看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英雄杨子荣就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杨子荣在老家的媳妇许万亮,因为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又背上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婚后孩子夭折的痛苦,忧思成疾,在1952年秋天,就带着说不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在海林,海林人民也在为寻找英雄的家乡而奔走。杨子荣是哪里人,烈士纪念碑上没有刻上,《林海雪原》的小说里也没有记载,只知道他是胶东人。《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上演后,杨子荣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英雄,海林人民觉得不把英雄的家乡找到,不仅愧对长眠于地下的英雄,也愧对全国人民。1966年,海林县委组织成立杨子荣情况专门调查小组,赴胶东调查寻找杨子荣的家乡。调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走访调查,翻阅了3000多份失踪军人档案,都没有发现与杨子荣相符的人员。第一次调查无功而返。1969年,海林县委与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调查。在当时的烟台地委和文登、荣成、牟平、乳山、海阳县委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走访,终于有了结果。最后确认,牟平县嵎峡河村的失踪军人杨宗贵,就是杨子荣。1974年,当一张杨子荣在东北剿匪被评为战斗模范的照片,送到杨子荣的哥哥杨宗福手里时,老人不禁泪流满面,百感交集,失踪多年的弟弟总算有了着落。

杨子荣家乡的干部群众,也为出了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1991年,中共牟平县委、牟平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这位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在县城中心位置建起了“杨子荣广场”,在城南原烈士参军集合的雷神庙西侧,建起了“杨子荣烈士纪念馆”,让烈士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全县人民永远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 萧 徐)

新闻， 备受折磨的 “真实”

● 杨克现

新闻“备受折磨的‘真实’”，是一篇反思回忆录。真实二字还要加上引号，足见新闻真实之艰难。

在我五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新闻违背真实的事情，并不少见，然而：

——最典型的莫过于大跃进“火红”的年代；

——最惨烈的则是十年文革的浩劫。

（一）

像一切实际工作者一样，记者工作也难免遭受失误的折磨。

我第一次尝到失误滋味的是1958年，农业大放卫星的年代。

那是个交织着欢乐与兴奋，失望与痛苦的年代。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纷纷下乡下厂，视察形势，鼓动大跃进。他们所到之处，随着新闻报道的强化，仿佛花团锦簇的祖国大地又增添了一层层光辉。我那时是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也多么盼望新疆有这么个光辉的日子，等待着有中央领导的莅临。

非常幸运。

就在葡萄成熟的季节，朱德副主席和康克清大姐一起来到新疆。他们先后视察了乌鲁木齐的天山牧场，火洲吐鲁番的葡萄沟，准噶尔

戈壁沙漠中的克拉玛依油田，以及天山南北一些著名的军垦农场。我虽无缘随行采访，却也从地方报纸上读到了新疆各地汇报的工农业战线上的喜讯。不过产量远不能与《人民日报》刊登的大小卫星相比。上不了中央大报。新疆，新疆啊！你怎么这样令人泄气！

可是，忽然有一天《新疆日报》用了套红的版面，破格地刊登了一则颇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从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腾空而起。这个县由于小麦丰收，全县平均每人拥有粮食高过了一万斤！

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木垒，这个在《新疆日报》上也极少露面的县份，一下子爆出了这样一则具有全国意义的大新闻！

接到报纸，初读为之惊喜，复读又为之叹息。我本是跑新疆农村的首席记者，何以几个月未抓到这则如此鼓舞人心的新闻，竟让地方报纸捷足先登，自尊心仿佛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蓦地，一种职业的羞辱感和追不上时代的失落感袭击了我：“我，国家通讯社驻新疆记者，何以漏报如此重大的新闻！”

这种失职的苦涩味与当时的“万马奔腾”的形势和我们新华社领导高度的政治要求联系起来，尤觉问题严重。其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射高产“卫星”进入了高潮。大字标题的喜讯，震撼人心的口号，天天充斥着《人民日报》。小麦“卫星”，从亩产七八百斤、一千多斤、两三

千斤,直到青海的八千五百八十五斤;水稻“卫星”来势更猛,亩产两千斤的消息发出不久,就有亩产上万斤的“卫星”,接着,广东亩产六万斤的“卫星”也放出来了。后来,还有更高的,广西,十三万多斤。印象最深的,是《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摄影记者摄于湖北某地的照片。那高度密植的稻穗上竟然直端端站立了三个儿童,真叫人叹为观止!……

没有任何报纸揭发这种虚假的新闻报道,包括我们新华社自己。难道说,真的稻穗会稠密到能够支撑起三个儿童来!?难道说,总社摄影部的发稿人、部主任都不曾怀疑过吗?更上一级呢!都没有,因为,大家的脑袋一直在狂热的激情中膨胀着,膨胀着……

直到1958年年终,我们新华社总社还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反而在一篇内部指示——《深入报道群众运动的初步意见》的文章中高度肯定和表扬着这种浮夸得令人吃惊的新闻报道。文章写道:“这一切都证明了(新华社)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记者队伍,对待今年的群众运动,基本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基本上执行了新闻报道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运动服务的方针……这种对群众运动所起的积极影

响是空前的。”同时,文章又不无遗憾地提到了我们队伍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新华社“有些记者对待群众运动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用现在时下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新闻导向了。而那时,新华社、《人民日报》都责无旁贷地联手充当着这种导向的角色。

作为新华社记者,我自己呢?那时我天真无邪。我是用一种极幼稚的心态,热爱着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对于所放“卫星”脑海里时时有一闪而过的疑团:“会这么高吗!”很快便在连篇累牍报纸版面文章与主观认识之间,寻找自己的差距。寻找差距时仍不免对报纸产生新的怀疑,却又不得不对自己的新的怀疑进行着更新的怀疑:“你能怀疑到底吗?”这些消息,不都是一贯把真实性作为我们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中央党报吗!新华社发出来的新闻岂能有假?纵使一篇有假,岂能篇篇有假?还有,要是文字有假,照片岂能有假?何况,我们知道报纸上的消息都有着严格的党委审查的制度。更何况,从8月10日到16日,新华社连篇累牍地播发了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天津地区一些粮棉大跃进,山区大炼钢铁也有着类似鼓舞群众斗志的新闻,我哪里还敢怀疑呢!……



《人民日报》关于“大跃进”的报道

当然，最初这些激动人心消息大都来源于内地省份。我们地处边陲，就我们分社来说，也不是不曾发过粮食增产的新闻。但比较起来，那都是正常年景的增产，唯其正常，便被远在北京的新华总社以值不得一提，“一枪毙”。我们曾经为之愤愤不平。但当地干部并不知道我们这些努力。特别是那些赴内地参观回来的自治区农业厅的干部和农业科学工作者，他们对于内地的“卫星”颇不服气，便常常以尖锐而友好、热情又挖苦的语调质问我们：

“新华社记者同志，难道说咱们新疆五六百万各族人民群众不是英雄的人民吗？难道占全国六分之一的新疆，发不出一颗‘卫星’吗？”

伟大的推理，问得我悚悚然，惶惶然。是的，现在不是都说“一天等于二十年”！毕竟时代是伟大的。最怕的是自己不能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缺乏作一个新华社记者的新闻嗅觉，还怕自己采访作风上存在问题，不曾追踪到高产“卫星”的地方；甚或是作风过于粗疏，面对着“卫星”却失之于交臂。好了，现在“卫星”由地方报纸放出来了，而且，卫星县竟然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在我们所在的乌鲁木齐专区，它证实了自己的“无能”。这“无能”的后果令人可怕。它隐寓着在一个伟大时代，一个立志要作好新华社记者的青年，行将交出白卷。

（二）

作为新华社年青记者，此时，惟一的出路是补报这颗卫星以洗刷自己的职业耻辱。自然，为了报道它，我得核实产量，因为，新闻一定要真实。

问题是怎样核实？到木垒县去，逐社逐队调查？

分社几位同志说：你，一名记者，就算化作十名记者，能调查清楚吗？木垒，地广人稀，几十万亩小麦，能一亩亩地验收，一斤斤地过秤吗？

那时，对于报道高产“卫星”，我们新华社已有了最严格的规定，大凡记者采写的高产“卫星”稿，每篇都必须送审，由地方党政主管部门签字方可发出。稍后，又追加了电报，还要

求更高级领导签字同意。可惜，唯独没有提到记者应当独立负责地深入群众中去调查。这究竟是表明总社对于高产“卫星”的极度重视，还是隐藏着不便明言的怀疑，叫人捉摸不透。但无论如何有两点是肯定的。即：总社在尊重地方领导方面，远远超过了它第一线的记者，在尊重地方高级领导时，又远远超过了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那时有个口号：跟第一书记走）。虽然，木垒的卫星，地方当局汇报给共和国的副主席，并且得到了首肯。但我认为，核实产量，仍然是自己——一个新华社记者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这不是说我比地方报纸有多高明。我害怕经过自己之手的新闻发生失误。我想，也许还有两种补救的办法能帮助我核实产量。

一是横向对比。我趁乌鲁木齐地区各县云集于专署开会之机，遍访各县的党政负责干部，向他们讨教：是否木垒今年的小麦长势，比其他各县特别突出？可惜问来问去，答案是：今年小麦长势都好，未见木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二是纵向对比。我又找木垒县领导查问，今年木垒增产幅度特大，可有什么特殊增产措施？例如：良种？深翻？密植？施肥？灭虫？防病？浇水？除草？……总之，毛泽东主席有关“农业八字宪法”增产措施中的每一字，我都穷追不舍。追问了半天，反而加重了我的疑虑。

最令人怀疑的是，这个县七月底八月初开始麦收，碾打刚刚开始，何来实际产量？况且，根据县委书记的介绍：木垒县地处天山雪山之阴，无霜期短，剩下的小麦，还要推迟到冬天“打冻场”呢！

这纵横对比的核产，核得我垂头丧气。我只好如实报告分社领导。因为，我不能将一条未曾核实，连自己也怀疑的消息发出去。

假如我能心安理得地一直拖下去，也许我此生将会减少许多折磨。但当时我立志响应我们新华总社的号召，要做个名符其实的新华社记者——名符其实就是要做大跃进高潮的促进派。过分的争胜心、自尊心，以及惧怕失误的复杂心理，不断地折磨着我。我反而认为，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假如新疆发不出一颗高产卫星，将会成为我们新疆分社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冷静地分析，解剖自己，这复杂感情中隐藏

着一种不敢告人的政治压力。因为,无论如何,我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反对一个共产党的县委,反对他们受到朱总司令赞美过的“伟大”功绩。我心里明白,反右派时,反对党支部书记都可以定为右派,何况这是新疆大跃进中放出最大“卫星”的县委!那时,我也用“反右”已成过去的事来宽慰自己。心想,历史哪能个个重演!但又看到中央报纸上不断出现的批判“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言论和重量级的文章,又不免发生了疑惑。我实在担心,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一种扼杀新疆农业“卫星”的政治账,一个“保守派服输记”的大帽子,不可避免地会落在我自己的头上。

我害怕失误,就像怕鬼一样地过了两个月,直到进入冬季,全国农业亩产“卫星”热潮归于沉寂,大炼钢铁的“卫星”又占据了报纸版面的时候,心潮总是无法平静……

我耐心地等待木垒县碾打后的好消息。我想:“迟早都得了结这笔冤枉债。”这年冬天,我打听到粮食征购中木垒最后落实了产量。全县粮食总产整整压缩了一半,我感到十分震惊,庆幸自己险遭虚报的失误,如释重负;却又觉得人均五千斤粮也是个不敢不报的大成绩。于是,挥手间,写下了木垒县人均五千斤粮的新闻。这则迟到的消息被《人民日报》放在了不显眼的地方,小得像豆腐块。这不能算是“卫星”,连高产也不是,是填补报纸空白的。虽然如此,也总算我还清了一笔债。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从今以后,谁也休想将保守派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新闻报道,我尊重的是事实!

我觉得万无一失。因为,我被告知这是征购时最后落实的产量,绝对不会再低,岂知1959年春荒,国家增购粮食,又传来了木垒粮食产量缩水的消息。我叫苦不迭,我实在后悔。我只感到了一种受人捉弄的屈辱,以及自己受骗复又骗人的羞愧,心里像吃了苍蝇一般地难受。

我不知道木垒的粮食产量是否还会连连下降,我只感到浮夸问题的严重。

不仅是木垒,可怕的是全国,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

我们的国家,因浮夸蒙受的巨大损失是一两年后才懂得的。粮食浮夸后面是高征购,高征

购的不良后果,一是一批搞浮夸、高征购的干部,被误认为是党的好干部普遍向上爬了一级,而那些实事求是的好干部则多半倒了霉。二,更为严重的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血泪的灾难。从1959年到1960年,我看到了灾难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日日夜夜,新疆的运粮汽车川流不息地将救济粮——细粮、粗粮直至制糖的甜菜渣急急地送往内地的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缺粮断粮的地方,以抢救生命垂危的饥民;另一方面,那些内地省份受饥受饿的人民公社社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千上万,仍潮水一般逃荒到被周总理誉为世外桃源的新疆来,看他们面黄肌瘦的样子,叫人心里难过。听他们的口音,问他们的故乡,不是河南、山东,便是安徽、四川,以及我们邻省甘肃的几个县。那正是我们的同行们报道高产卫星、跃进亮点最最多的地方。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渐渐丧失了50年代的纯真,思想变得复杂起来。我不得不常常用痛苦的心情审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审视我们的“舆论一律”不敢面对真实的新闻队伍,又审视着心怀愧疚的我自己。

(三)

1959年,1960年,两年岁末年初,新华社有关部门,都少不了检查。因为,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彻底地清理是1961年春天,中央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严格要求总结那些造成我们民族严重灾难的错误教训。就新闻战线来说,上面指出,主要是:“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在政策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三句话虽然简单,却内涵了几亿人民难以数计的苦痛与灾难。在贯彻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时,新华社总社连续检查了1958、1959、1960三年来在国内新闻报道的错误。检查的范围不仅包括农业、工业、财经、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而且也检查了上级指出的在新闻报道中严重的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向中央写出了报告。后者,指的是: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各地视察和会议上的讲话……绝大多数

数没有经过中央领导本人审查，也未经过中央讨论批准，造成了下面大刮五风的一种借口，影响远，危害大。

之后，国内各个分社也都纷纷检查了三年来类似的错误。在新疆，我们分社领导授命我筹办一个“错误稿件展览会”。我立即想到了自己那篇木垒县粮食增产的消息。想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愿意认错，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痛苦与悔恨，为分社年轻记者增加一些免疫力，为自己赎回一份罪责。

当然，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我想的更多的是：我们党的新闻战线，何以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整体地失职的严重情况和原因。

这是个难以回答即使在几十年、百年之后也不能不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作为与资产阶级新闻相对立，我们一贯把维护新闻的完全真实视为无产阶级党性根本原则的新闻队伍，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几乎是整体地丧失了独立思维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理智，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五风”，不曾有任何公开的抵抗与揭发，反而充当了上上下下那些唱着高调、自觉和不自觉的“假大空”“官员们”的“驯服工具”！？

探究这样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地处边陲，知之不多，只能存疑，难以解惑。仅仅是办一个“错误稿件展览会”，在这种展览会上，凡属错误稿件，每篇都加以评析，连同原稿一律上墙。重在吸取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不出几天，展览会就“胜利”开幕了。总的看法是，新疆分社三年来发出的稿件，大部分都能经得起检查，错误稿件只是一少部分。分社无论是在农业、钢铁，都不曾向全国发过一颗“卫星”。当然，大家都明白，这一切是和新疆自治区党委，特别是王恩茂书记遇事慎重稳进，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王恩茂说：“没有‘卫星’你放什么！”）

展览会上，惟一激起波澜的是《新疆水利工地温暖如春》一稿。这篇稿件刊登于去年初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要地位，因为目标显著又严重夸大失实，曾经遭到水利工地干部群众来信抗议，这在新疆分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调出记者原稿上墙公布，才发现那些夸大失实，

过分渲染的字句，大多出自我们分社社长程堃——人称“老将军”的手笔。程堃是战争年代的老记者，看上去豁达大度，全然一笑置之。麻烦的是他的妻子程素，她是分社党支部书记，竟然怒气冲冲前来找我算账，说是不应该公布老将军的改稿，我只好以社长并没有说什么回敬了她，安慰她说，不追究责任，也不上报总社和自治区党委，她方息怒，不再说话。所以，直到第二年夏天，我调往陕西分社以后，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是我，为我们新疆分社成功地举办了一次重在教育的展览会。

谁知，以后的情况证明我料事有误。一年后，这次“错误稿件展览会”主办人的我却变成了反对高产卫星，也就是反对大跃进的一个有力证据。这正是八届十中全会大抓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再加上我被揭发出的还有：对于那些逃荒讨饭的人民公社社员的命运的同情；又听到过一些贫下中农对于共产党、对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有所非议，便构成了绵延到“文化大革命”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于是我一下跌入了黑暗的深渊，无以自拔。

我重新受到折磨，我辩白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反对毛主席，重重的折磨却熬不到头。直到被革命群众“解放”，结论上还挂着政治问题，我不得不负罪工作，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时，重新作了结论，才最终从心灵的折磨中走了出来。这之间，时间又过去了8年。

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三年，不知道是否因为报道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太忙，新闻战线竟未能顾及本身的拨乱反正，坐失良机，以至于在改革开放、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今天，新闻的真实还时不时地受到各种折磨，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期望要求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唐人杜牧有云：秦人不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视为崇高的党的新闻战线，一定会走过这种怪圈。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教训，千古都是一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所了解的 “真理标准”一文 发表经过

● 王强华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但约作者胡福明撰写文章则是在1977年的8月,距离“两个凡是”公开发表的1977年2月7日,仅仅六个月的时间。

约稿的指导思想取决于两个要素,一个是当时总的形势和宣传要求,另一是报纸的特色和需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总的形势是,党中央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取得一定成效,但普遍遭遇到一道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在“拨(批判、纠正)林彪”“四人帮”之“乱”时,有人动辄就声称这个是毛主席的指示,那个是毛主席决定或批准,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拨乱反正也就深入不下去。形势需要必须从根本上也即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具体来说,必须要摆正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实践与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经济与政治)的地位,弄清楚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谁决定谁等重大理论问题。

《光明日报》是以理论和文教宣传为重点的中央大报。当时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担任理论部党支部副书记、哲学组组长,负责编辑《哲学》专刊。根据当时的形势,《哲学》专刊责无旁贷地需要组织和编发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文章。正好1977年8月,江苏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举行了以“经济与政治关系”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我应邀前往参加,并在会上第一次结识了胡福明。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师。我听了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他思想解放,而且

有理论素养和勇气,当即就邀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稿,并按一般程序向他提出了文章的要求。

胡福明同时寄来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批判江青过去鼓吹过的“女人是生产力”的谬论。另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福明的稿件是1977年9月寄来的,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编辑部有人认为,前一稿件是江青的谬论庸俗不堪,不值得从理论上批驳;后一篇则被认为“纯”理论的色彩太浓,论述的又是一般性的理论原理,没有多少新意,两稿均准备退稿处理,但因稿件是我约的,就留待我返京后决定。1977年12月我从外地返京,阅稿后认为前一稿的确不能刊用,同意退稿;而后一稿虽然讲的是一般原理,而且引经据典的话较多,理论色彩较浓,但文章讲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突出的是实践在检验真理中的重要作用,联系到“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大肆宣传的“一句顶一万句”、“一学就灵、立竿见影,制造精神枷锁,阻碍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我认为它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当前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宣传要求,就决定留用,并在作了初步删节以后,于1978年1月14日发排了。尔后到1978年4月10日,又经过五次修改,以胡福明的署名放在1978年4月的《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头条)的清样上准备出版,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当年我作出这样的抉择的动因,除了从我对胡福明的稿件修改中可以看出思路,还可以从由胡福明保存的我于1978年1月19日和1978年

3月13日给他的两封原信得到印证。第一封信是在排出文章小样以后寄小样时写的,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第二封信是在处理稿件过程中写的,提出了修改稿件的具体要求: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任毛主席)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意见的话加上。”

按照报社的规定,登载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的清样送请总编辑杨西光审阅。他慧眼识珠,果断决定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上撤下,要求作修改以后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他把这件事当作报社的头等大事,为此付出了极大精力。他亲自动手并精心指导我们对此篇文章进行修改,特别是当他得悉作者胡福明于1978年4月13日从南京来到北京开会的消息,决定立即把胡福明接到报社,并把据闻正在撰写同类题目的文章的中国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请来,杨西光亲自主持与我们开会,商讨文章的修改。杨西光明确指出,文章的修改要坚持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冲破禁区。他的这个意见在我当时记下的谈话要点中得到印证。我记录的第一条就是:

“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临末又记下:“注意: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

综上所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实》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社会上有人说这篇文章组织来以后杨西光不敢发表,所以找了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并最后送请胡耀邦审查同意后才发表。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杨西光是横下一条心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是他听说中央党校也在准备)写类似的文章,为了集思广益,把胡福明的文章改得更好,才这么做的。送请胡耀邦审阅最主要的原因是杨西光在“串连”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转载、转发时,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请某个“权威”看看。为了争取更多的媒体转载、转播,杨西光同意此文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送请胡耀邦审查。以后他听到上述《光明日报》不敢发表的传言,他认为并非如此,于是就愤然对中央党校的同志说:此文如果在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刊发,请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225、236页),以表示他愿承担此文的政治责任。据我了解,即使此文不送请胡耀邦审查,有的媒体因此就不转载、转播,杨西光也会义无反顾地把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责任编辑 萧 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报特约评论员

最近发表的胡福明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广泛讨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又一次大觉醒。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思想领域里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又一次大觉醒。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思想领域里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什么样的真理与谁符合?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一个实践的哲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0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否同意而有所分歧。没有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设想的。”(《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否同意而有所分歧。没有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设想的。”(《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否同意而有所分歧。没有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设想的。”(《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否同意而有所分歧。没有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设想的。”(《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否同意而有所分歧。没有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设想的。”(《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否同意而有所分歧。没有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设想的。”(《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否同意而有所分歧。没有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设想的。”(《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否同意而有所分歧。没有社会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设想的。”(《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从学做饭到家宴

● 沈 容

我年轻时从不会做饭。上学时在学校吃饭。参加工作后在食堂吃饭。有了小孩就在家吃，由保姆做饭。

“文革”期间在干校，我属于“牛鬼蛇神”，没有资格到厨房做饭。干校对我们这号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只是在会餐时叫我们做一些洗菜、摘菜的事。

1970年，我和老伴李普先生被“解放”。我们可以在老乡家借一间房住，可以自己做饭吃。

我最难忘的是我们俩第一次做饭的情景。粤北农村的冬天，我们在房里生了一个炭盆，在上面烧水、做饭。我们第一次做饭，把米洗了，加了水，放在炭盆上，两人坐在炭盆边上守着。眼看着热气从锅子四面冒了出来，显然是水开了。我想打开锅盖看看，李普说：“不能打开，听说打开后，会煮成夹生饭。”我似乎也听说过有此一说，于是就不敢打开锅盖看了。但是饭什么时候算熟了呢？我们都不知道。四只眼睛看着炭盆上的饭锅，既不敢打开，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煮熟。这就是我第一次做饭的经历。

以后我有资格到厨房里帮厨了，我看到大饭锅里的水开了以后，不仅可以打开盖子，还可以用饭勺搅两下。我还看到精于烹饪的女同胞们如何做出各种可口的菜来。这是我学习做饭菜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好朋友王匡（是他把李普介绍给陶铸，李普才来中南局的）“解放”后，他的夫人田蔚来干校看他。他可以在十五分钟内把一只活生生的鸡杀了，并把一盘鸡肉端上桌来。这真是绝了！王匡的父亲是个厨师，所以王匡很会做菜。

我看了他操作的全过程。过去人们杀鸡，都是把鸡杀了，放了血，把鸡放在盆里，把烧开水浇在鸡身上，然后拔毛。这拔毛是很费时的一道工序，尤其是细毛，更是难拔。匡兄我们称他匡兄，他管李普叫李公）处理鸡毛的过程完全不同。他把水烧开以后，稍微放一点冷水，然后把杀好的鸡在盆里一转，把鸡头鸡脚放在水里浸一浸，用手在鸡身抹几下，就把鸡毛通通抹掉了，比人们平常拔鸡毛又快又干净。然后，他把鸡胸上的肉

切下来，切成丁丁，在锅里放上油和作料，放下鸡肉，扒拉几下，一盆香喷喷的炒鸡丁就放在桌上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说：“匡兄，你有这样的好手艺，何不到大厨房去露一手，让我们也吃得好一点。”王匡说：“千万不能，你做得好了，他们会说：你看他，做工作不怎么样，做吃的倒很内行。你要是做得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又会说：你看，他只会吃，不会做。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更不得了了。”这话有理，我们都给运动整怕了，虽说已经“解放”，还是心有余悸。

匡兄是我学烹饪的第一位老师。

广东人很讲究吃，也精于厨艺。就拿有名的盐焗鸡来说，听说原来的做法是把粗盐在火上炒得很热很热，再把鸡用做丝棉袄的薄纸包好，放在盐里。等鸡熟了，盐味进入了鸡肉，而鸡味一点没有丢掉。这做法太费时费事，后来的盐焗鸡大都是用椒盐粉抹上，放在锅上蒸十七分钟，味道同样鲜美可口。

我在广东从做第一锅饭开始，学会了几道广东菜。

1972年，我和李普调到北京，粉碎“四人帮”后，李普调到新华社总社。总社有一位特级厨师叫袁学怀，湖南人，是李普同乡。有时我们请几位朋友在家吃饭，请他来帮忙。我又从他那里学了几道菜。

那时有朋友来，我们常留他们在我家吃顿饭。当我做盐焗鸡时，李普必定要介绍这种鸡的做法。他会绘声绘色地说：这种鸡必须严格蒸十七分钟，如果蒸十八分钟，鸡就老了；如果蒸十六分钟，鸡就还不熟。他的这一番理论，常常使朋友们听得一愣一愣的，以为他十分精通烹饪之道。有时，孩子们说话了：“爸爸只知道理论，从来没做过。”引得朋友们哈哈大笑。

1981年，我们大规模地举行了一次家宴。请的都是湖南人，有曹瑛夫妇、李锐夫妇、廖沫沙夫妇、于刚夫妇、黎澍夫妇等。这是一次湖南同乡的聚会、老友聚会、更是老战友劫后余生的聚会。这些同乡、老友在几十年中都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今天能聚集一堂，真不容易的！那时还不大兴在饭店里请客，就由我担任厨

师。我把我学会的手艺全部拿出来了。每上一道菜,客人们都叫好。我想,这倒不一定是我的手艺真有那么好,而是这次老友相聚太不易,太不寻常,不管什么菜,都觉得特别好吃。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诗兴大发。我们赶快把碗筷收走,拿出笔墨,铺上宣纸。曹瑛写了一首他在“四人帮”监牢里做的诗:

白天阳光少,黑夜臭虫多。
一瓢糊糊面,两个窝窝头。
固是维他命,无如奈我何!
谁解其中味,南无阿弥陀。

曹瑛 1925 年参加革命,曾反对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反对康生的抢救运动。“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他说:这是在监牢里做的,当时没有纸笔,不可能写下来,这天才书写出来。

吟诗、写字李锐是打的头炮,这是他的性格和作风。他口占一首,写道:

举杯难得竹林欢,都是古稀花甲年。
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

这诗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李锐从庐山会议后,历尽劫难,1979 年才返京复职,住在木樨地 22 号楼,黎澍住 24 号楼,我们住三里河,和木樨地仅隔一条马路。我们三家过往甚密,我们常常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往事和振聋发聩的思想。他们两位实在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有一次,我请他们两位来我家吃西餐,我做了罗宋汤、猪排、沙拉等,他们吃得很开心。黎澍说:“你哪里弄来那么多猪肉?”

1988 年冬天,我和李普到海南岛过冬,本来准备多住一些时候,说来奇怪,有一天,突然觉得要回北京,于是就立即回京。到家才知道黎澍已不幸去世,我们刚赶上遗体告别。黎澍的夫人徐滨告诉我们,黎澍在病中几次问:“李普回来没有?”“李普怎么还不回来?”李普和我把这位可敬的老夫子一直送到焚化炉前。

廖沫沙曾是全国闻名的“三家村”三家之一。他和江青在上世纪 30 年代有过一些过节,江青不会放过他,在“文革”中他当然被整住了。“三家村”另两家:吴晗和邓拓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先后自杀。廖沫沙成了“三家村”中硕果仅存的一家。家宴这一天,廖沫沙举笔挥毫写了一副对联:

胸无点墨真干净,笔重千钧保吉祥。

这两句话意味深长。沫沙才气横溢,抗日战争初期

他在长沙当《救亡日报》的总编辑,用笔为革命而写作。他身无分文,家里无以为生,有一天他妻子先让两个孩子吃了毒药,然后自己也吃了毒药,母子身亡。黎明之前沫沙下了夜班回家才知道,你说这有多惨!沫沙继续用笔战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写作。可是,赶到他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笔重千钧要保吉祥了。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揪心的心境!

他的晚年似乎很孤独。我和李普有一次去看他,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尊医嘱,谢绝探访。”我们犹豫了半天,是不是进去。为担心他的身体,我们还是敲门进去了。沫沙的身体还很好。他说:“这纸条不是对你们的,不要管它。”这张纸条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李普最后一次去看他,回来告诉我:他想和沫沙好好谈谈,但是什么也没谈成,因为他家里有一人老在打岔,弄得李普毫无办法,只好告辞。走时,沫沙送他到门口,紧紧拥抱他。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很后悔,应当多去看看他。

附带说一说,李普也沾了廖沫沙他们的“光”。北京批“三家村”,中南局也批“三家村”。李普曾鼓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多多练笔写文章,写文章的人被打成广东的“三家村”,李普就成了这个“三家村”的后台。

沫沙写的那副对联,后来我们裱好了,在厅里挂了很久,以后又常拿出来挂。那天他没有带图章,后来我们也没有抓紧请他盖。

李普说他不会做诗,那次也凑了几句,请沫沙修改如下,可以作为这次湖南老朋友聚会的纪念。

椒红酒绿添诗兴,风雨潇湘忆少年。
莫道洞庭麻雀小,惊涛骇浪舞翩跹。

这首诗我把它镶了镜框。李普有一次开玩笑说:“我想打入书法界。”我说:“这容易,我帮你打。”于是就把手这首诗的镜框挂在墙上。我说:“你的字挂在墙上了,这就算打入书法界了。”

这次家宴以后,李锐也要办一次家宴,而且要赛过我家。这也是李锐的性格。他办事特别认真,找来了菜谱,要按菜谱一道一道做菜。他刚乔迁到木樨地,一应家常用品还没有备齐,就叫他女儿南央来我家借餐具。接着我们又在李锐家热闹了一场。那天十分丰盛,果然赛过了我们家,李普伸出了大拇指对李锐说:“还是你第一!”

(2004 年 4 月 17 日)

(责任编辑 叶方)

民国时期中医废立之争

● 奚霞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的成就。

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一、北洋时期的首次抗争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

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

而对这种情况，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

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逶迤，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

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绝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二、国民党时期的废止中医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限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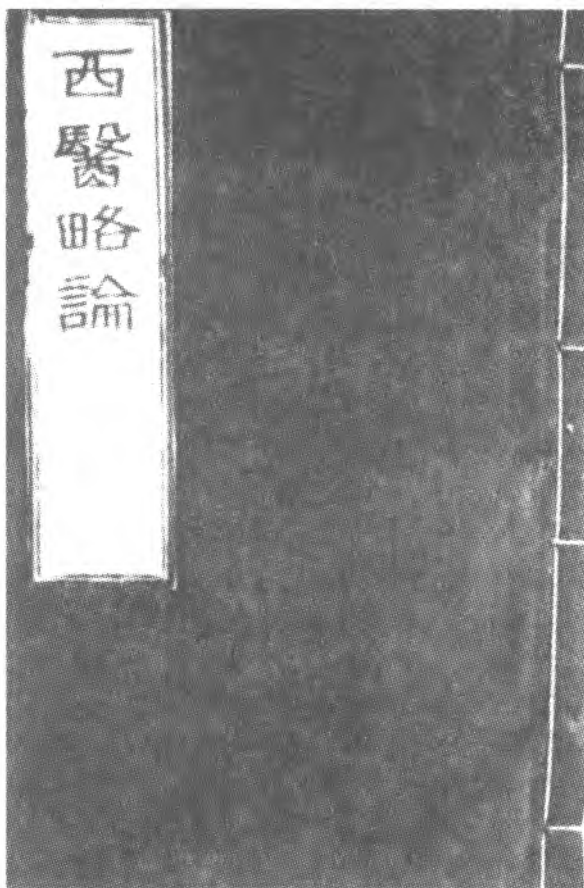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病;(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

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询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后来定这天为“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傖、李石曾、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



1857年上海仁济医馆刻印的《西医略论》



1920年成都的中医传习所毕业生合影

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

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人们正奇怪呢,难道国民政府忽然热心起中医来了?其实是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情绪。国医馆的经济来源,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要靠分馆和各地中医界的接济来维持。这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特殊组织,是在特别情况下建立的畸形机构。它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纵,国医馆名为学术机构,实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形同虚设,

曾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

三、公布《中医条例》步履维艰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辞批驳,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各地中医团体纷纷质问。1934年1月,中医界召集全国代表请愿,要求尽快公布《中医条例》。最后妥协的结果,焦易堂发表了《为采行中医条例告国人书》,以不了了之的办法由国医馆执行起行政权来,行政院则睁一眼闭一眼,保持沉默。接

着,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

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终于,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主义,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不久,卫生署颁布了“中医审查规则”,它名义上是《中医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医条例》。如其中“中医条例所称的中医学校,指经教育部备案或各地教育主管机关立案者”,而教育部并未把中医学校列入学系,这就等于把所有中医学校毕业生的中医资格全否定了。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中医审查规则由卫生署管理,而卫生署官员中又没有中医的不正常状况,1936年12月,中医界组织了18省市120多位代表向立法院请愿,要求卫生署增设一名中医副署长,以体现中西医平等待遇的原则。在立法院讨论时,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优劣的论争,结果设副署长的要求未获通过,只在卫生署内增设一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而实际上卫生署从不让中医委员会参与行政。

四、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

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肄业三年领有毕业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

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

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1947年国医节,长沙组织了500人的示威游行,并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中西医平等,各省市设立中医药学校,实行中西医共管卫生权,奖励中医科研,中央拨款补助省级中医院等。郑曼青、谢会东等十人携带行李,冲进南京政府,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亲自答复请愿要求。蒋拒绝不见,代表们被警察强行拖走。这次请愿影响很大,南京报纸作了多次报道,国民党中央电台进行了歪曲性宣传。

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也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的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我国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曾一度遭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其自身具有的西医药所不能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于右任的乡愁

● 金光群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德高望重,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1949年4月,被国民党特工挟持去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在台湾闲居15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大陆,盼望祖国统一。但长期处于失望中,受浓浓的乡愁的困惑,忧郁而死,临终也未能实现他的愿望,抱憾终生。

一、重点 护送”赴台对象之一

1949年4月20日,是于老在南京最后一天。这天下午5点多钟,我到南京宁夏路2号于公馆采访,遗憾的是:这次我未能见到于老,我走进楼下熟悉的大客厅,坐到我常坐的沙发上。经常在楼下招待来客的于老的副官,照例泡一碗盖碗茶送过来,低声告诉我,院长在楼上收拾东西。说完他转身上楼去通报,我扫视大客厅,有四五个客人,其中有两个年纪不大,穿黑色中山装,不像是平时常来的客人。不一会儿,副官下楼,手拿一卷白宣纸,弯腰在我耳边说,于院长今天没有时间下楼会客,叫我把这副大对联送给你,院长讲来不及题款,边说,边请我打开看看,大概是怕引起“客人”怀疑,的确,在坐的几位,都投来带有疑惑的目光。我同副官分别展开上下联,只见字迹苍劲,如龙飞凤舞,我称赞说:的确是一副书法精品,而且是于老特殊的风格,可惜,只匆匆瞥见一眼,未记住内容。我卷起于老墨宝,辞出客厅时,请副官代我向于院长道谢。

事后得知,楼下那两位年轻人,有特殊使命,是负责“护送”于老去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早就作计划,部署特工对一些“靠不住”的高官,要防止他们投向中共,要分别妥善“护送”去台。当然,“护送”就是“挟持”,不过好听一点而已。

次日午后,我发完晚报稿后,又驱车到宁夏路2

号,已铁门紧闭,人去楼空,据留守的看门人说:院长昨晚已由“客人”陪着”走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跨出一步,会影响他以后的命运。前几天,于老差一点,有机会去了北平,就会留在大陆。4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想利用于老的声望,派于老去北平协助和谈。可惜决定的太晚,当时于老已作好准备,专机已待命起飞,北平和谈已到了最后阶段。中共代表已于4月15日将和谈协议草案最后文本交出,国民党谈代表团进行研究,必须李宗仁签字,决定派人回南京述职,送协议草案给国民党政府当局讨论决定,因此通知于老暂勿起程,次日即派人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党政人员开会,否决了这个草案,李宗仁不敢在协议上签字。因此,人民解放军于21日凌晨大举过江,于老已被挟持去了,再也无法留在大陆。于老这一步未迈出去,以至在台湾住闲,日夜处于乡愁抑郁中,15年后怅然辞世。

二、和平愿望的破灭

南京解放前的几天,我几乎每天都要到于府采访最新动态。当我从别处得知于老将以“特派代表”赴北平时,曾立即去于公馆采访。这一次,是专为于老赴北平的事而来。刚落座不久,请副官通报后,于老就从楼上走下来,于老微笑着,看来心情很好。

我急于想知道于老对此次北平之行的一些情况,多余的话没有说,就直接提问:李代总统为什么要请您去北平协助和谈?于老知道我会问到这些问题,于老说:我也不知道李德邻是怎么考虑的,他跟我讲,北平和谈已经进行好几天了,为了推动和谈进展,我想有劳您辛苦一趟,作为“特派代表”,加强和谈,问我是否同意。这件事来得突然,容不得我考虑,不过,我觉得和平

是好事,我一向反对打内战,因此,我表示愿为和平尽力,就这样定了下来。接着我又问:您对和谈前景有什么想法?于老抚摸一下长须后说:只要大家都能真正为老百姓着想,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都作些让步,就有希望谈成。再说,当前人心思定,老百姓不希望老打仗。近百年来,兵灾不断,尤其八年的艰苦抗战后,又打了两年内战,人力、物力损失太大太多,战区人民受到极大苦难,急需休养生息,重整家园,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不愿意处在战乱之中。我知道和谈担子很重,我要去了北平,也就尽我一点力量,争取和谈成功。最后我问:您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吗?于老回答: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等北平电话,随时可以起程。我站起来说:“那就祝您一切顺利!”

告辞回到报社,写了几百字的专访,发给晚报和外地的《新民报》。于老的愿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北平也没有去成。

三、爱小孩、捐奶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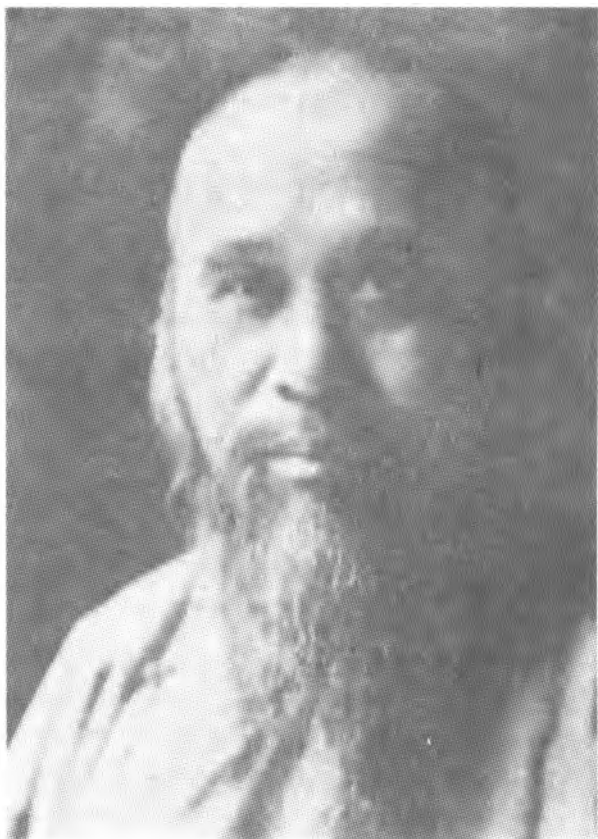
《新民报》南京社一个编辑来找我,说他妻子在北平《新民报》工作,刚生一个小孩,北平买不到奶粉,能否托于院长捐一罐去?我觉得很为难,固然我同于院长很熟,但是,在这种时刻,托带东西,为点小事去麻烦他老人家,是否合适?我说:这时候托于老带东西,不太好说,劝他不要带。这位同事爱子心切,一再央求,要求我试试,如果不行就作罢。我只好答应试试看。次日下午,我又去于府采访,把一大罐奶粉带在车上。于公馆的客厅里,总有些客人,这几天来客比平时还要多,我进门后同于老副官打了一个招呼,就找空沙发坐下。于老下楼来,同一些客人见面,有的托带信件,有的说几句话,不一会儿先后辞去。于老站起来移坐到我身旁时,我问于老何时起程,于老讲还在等北平的电话。看到于老精神还好,又没有其他客人,就试着探问:我们《新民报》北平社有一个女职员是这边同事的妻子,刚生一个小孩,北平奶粉不好买,这位同事托我问问您,能否给他捐一罐奶粉?于老一听,给小娃子捐奶粉,显得非常慈祥,满口答应。随后吩咐副官,等一会儿把奶粉放到车里。当我告辞出来到院子里,从我的车厢里取出奶粉,副官已打开于老坐车的后背箱盖,我也端着奶粉走过去,看到后背箱已放一些东西,我注意到有两扎信件,一扎写:毛润之(毛泽东)先生,另一扎写:李任潮(李济深)先生等。我把奶粉交给副官,又留下北平《新民报》

收件人的电话号码,请他到北平后,在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叫她来取。我暗自高兴,在这个特别时期,能托于老带东西,确非易事。

4月19日晚,北平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通知于老暂勿起程,使于老抱憾终生。

四、主张和平民主

于右任是陕西省三原人,生于1879年,1906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8年组织靖国军,任总司令,进行护法战役;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随孙中山北上,反对军阀统治。以后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审计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监察院院长等职,长期以来,于老为人诚恳,作风平易近人。他留了长须,到花甲之年,银白色的长须盈尺,有人称他为于大胡子,也有人称赞他是“美髯公”。于老平时写字作诗,只盼天下太平。当监察院长达20年。国民政府标榜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国民政府设五院,即立法、行政、监察、考试、司法五院。监察



于右任

院权力看起来很大,政府大小官员,都在监察之内,可以弹劾高官。实际上,蒋介石把监察院当作“冷宫”,不论监委们如何慷慨激昂,提出多少“案件”,结果都难于付诸实行,监察院当然管不了蒋介石,也管不住高官,充其量只能拍几个“苍蝇”。于老一贯主张民主和平,同共产党合作,反对打内战,同周恩来及民主人士有些来往,开起会来,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提出国共要和衷共济、停止内战等等。西安事变后,他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这些都让蒋介石非常头疼,可是,于老德高望重,又奈何不得他,因此,表面上对于老很谦恭,于老提出小事,就给点面子,大事却寸步不让。如有一次杨虎城老母在家乡病重,于老向蒋介石提议,让杨回家探视,蒋介石就是不答应。背后说于“讨厌”;“多管闲事”。所以蒋介石一直让于右任担任有职无权的院长,表面上是担任要职,实际上同坐冷板凳也差不多,所以20年也未更换。

于右任还是老报人、诗人、书法家和教育家。1927年开始研究中国历代草书;1931年创办草书研究会,以后编著出版了《标准草书》、《草书字典》等专著。1905年,他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这就是今天的复旦大学,到2005年正好是100周年。1907年以后,他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在报上撰文反帝反清,提倡民主思想,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验,他还以诗人身份参加文学团体——南社。

五、爱祖国、爱复旦

我1946年夏天到南京《新民报》采访部工作,听说于老从西北视察归来,以前对于老就有很深的印象,决定去访问他。一天下午,驱车到宁夏路2号于公馆。事前没有约定,按门铃入内,是一位瘦瘦的副官来开门,我递上名片(名片上印的是并排五地南京、上海、北平、成都、重庆的《新民报》记者),说明来意,我知道他是复旦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讲了我是在复旦大学毕业的,请他通报。他把我引进大客厅,泡上盖碗茶送来,就持我名片上楼去了。很快,就见于老下楼。他穿一套中式白色褂裤,宽衣大袖,特别是满脸银须飘拂,神采不凡,我立即起身相迎,于老满脸堆笑,一边握手,一边还用他的左手拍拍我的右手背,显得非常亲切。他已听说我是复旦读过书的,先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的?我说今年学校要复员迁回上海,我们1946届毕业生,在5月底就提前结业,举行了毕业典礼,我6月才到南京。他问学

校一些事情,又问陈望道等教师的近况和我是哪里人等等,我都作了简略的回答。于老讲:看到复旦的发展壮大,毕业生遍布全国,我特别喜欢,你们都在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尽力啊!

我很想听听他访问新疆的观感,就转入了正题,问于老:听说您访问了新疆,一定有不少事情印象很深,想听听您对此行的印象。谈到这次远行,于老的头脑中仍有不少新鲜影像,立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说:新疆地方大,很美,有大沙漠,也有大草原,还有很丰富的矿产,水果也多,出名的有葡萄、苹果、香梨和哈密瓜,农产品的棉花好,草地多,牛羊也多。矿产中有石油、煤炭,都有很大的开发价值。那里居住有十多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较多。人们都极好客,都爱我中华。维族有个人叫包尔汗,很聪明能干,他把孙总理(中山)的全本《三民主义》都翻译印刷出来了。新疆风景好,天山南北有许多风景区,我最喜欢天池,这是一座高山大湖,在海拔1900米的丛山峻岭中,一湖碧水,四周林木青翠,高大的云杉耸立,高山上雪峰围绕,湖水深达几十米,碧蓝如镜,空气清新,沁人心肺。湖滨安静沉寂,偶尔有飞鸟出现,打破空气平静;人行岸上,倒影水中,水上蓝天白云相映,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美极了。于老像作诗一样,赞颂天池之美。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重要地段,有很多古迹,高昌、交河有古城遗址,库车、拜城的千佛洞,吐鲁番的火焰山,喀什的清真寺等等。于老一口气讲了很多,那时没有录音机,我一边仔细听,一边记要点。看得出来,于老讲了这些,仍意犹未尽,还有一些美好的记忆,有机会还能再谈一些。最后他说,以后可以随时来他这里。这也是对我这个复旦后生的特殊优待。

随后两年多,我去过于老处的次数不少,有时是为了证实某一重大新闻,因于老可参加国民党政府一些首脑会议;有时是为监察院的一些议题;有时也没有一定目的,但作为一个记者,往往会从于公馆内外,得到意外的信息。我每次去,只要于老在家,一般都会接谈。平时于老不大谈国家大事,也不谈时弊,但言谈间总希望天下太平,民富国强。因为“复旦”的情结,我在南京时,同于右任、邵力子等老一辈复旦人就亲近,常去他们府上走动,使我获益匪浅,甚至有外地记者,要求我带他去见于老、邵老,如天津一位驻京记者,我向于老引见,于老也予以接见。邮政总局的人,要去见邵老,我也领他们去。

于老送我的大对联,既未裱,也不敢挂,到文革时

被焚毁,非常可惜,至今还后悔,为什么不收藏好。

于老到台湾后,已不再担任监察院院长。平时无事可作,写写字,偶尔写点小诗,常倚杖站立,眼看西北方,那边“有我大陆,有我故乡”。1969年,于老80周岁,有老友倡议为于老庆寿,他心情凄苦,摇头拒绝;他说在此乱世,还做什么寿,于是吟诗曰:“平生只愿看到太平时”。在台十几年,度日如年。郁郁终日,到83岁时去世。离世前作《望大陆》,诗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读了此诗,令人鼻酸。

于老至死,还一心盼望祖国统一,期盼能重返故里。但他在绝望中含泪而别,只能魂归故里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历史转折的前奏》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决策揭开了回春的历程。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其从复苏趋向繁荣的历程,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作者披露了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件的内幕,及新时期文坛从队伍建设到方针调整等诸方面的来龙去脉。作者致力于收藏未曾刊布的文坛名家书札和档案材料,及对诸多文坛老前辈的采访,因而使本书材料鲜为人知、丰富可信。

《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的英雄们,他们与第一条战线上人民解放军英雄一起,怀着对真理、对理想、对光明未来的真诚追求,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壮丽诗篇,他们托起地狱的闸门、帮助万千受难者逃出地狱,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程	冯建辉	16.50	5.00
历史转折的前奏	程中原 夏杏珍	3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28.80	5.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科戈诺夫	78.00	8.00
动荡岁月秘闻	温乐群等	72.00	9.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群	21.00	5.00
张闻天年谱	张培森	65.00	8.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8.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5.00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	徐庆全	24.00	5.00
再生中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李艳 熊志勇	44.80	7.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们 肖思科	28.00	5.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5.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安	26.80	5.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5.00
我向百姓说实话	李昌平	20.00	5.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希	25.00	5.00
中国人物年鉴2003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68.00	7.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5.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8.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5.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5.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5.00
改革风云中的万里	张广友	20.00	5.00

“世界第一美术家”

——纪念刺绣艺术家沈寿诞辰 130 周年

● 邱 健

在笔者的故乡江苏南通市早期著名实业家张謇的故居中,陈列着一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绣品:画面上风沙滚滚,城堞逶迤,终年积雪的长白山遥遥在望;在茫茫的旷野中,孤独的牧羊人凝视着低头吃草的羊群……

这幅给人以特有的古朴、苍茫之感的塞外牧羊图,就是我国近代著名刺绣艺术家沈寿女士的遗作。

“仿真绣”的创始人

沈寿原名雪芸,号雪宦。清光绪初年(1874年)生于江南景色如画的苏州城一个富庶的古董商人之家,自幼深受家藏艺术品的熏陶。她所生活的年代,是苏州“闺阁绣”极为风行的时期,当时苏州有“闺阁家家架绣棚,妇姑人人巧习针”的盛况。雪芸八岁开始与姐姐同棚习绣,十六七岁,即以绣艺闻名乡里。当时宫内常派专人到苏州购办丝织绣品,剔选甚精,许多人家的绣品都被淘汰了,唯独沈家母女的绣品备受青睐。

1893年,美丽而多才的沈寿嫁给了当地的举人余觉,由于丈夫能诗善画,常和妻子研究绣艺为她设计画稿,使沈寿的刺绣艺术达到新的高峰。

1903年,沈寿开始研究明代露香园彩绣技艺,亦称“顾绣”。“顾绣”是明代上海名人顾会海之妾,因刺绣人物山水花蕊逼真,颇有生韵,因之她的绣艺被誉称为“顾绣”,堪称一绝。沈寿在继承顾绣传统针法的基础上,改进了原有的套针法,按照所绣真实景物组织针脚纹路,使针迹隐藏,物象逼真,更具立体感。这一创造性发展,更开“仿真”绣一代新风,使苏绣艺术达到了新的境界。

《八仙上寿图》令慈禧惊喜不已

光绪三十年(1904年),适逢清末慈禧太后七旬寿辰,沈寿夫妇经人举荐为庆贺慈禧寿辰绣了一幅通景绣屏《八仙上寿图》进京呈献。慈禧将此幅绣屏视为绝世佳品,立即传旨:“着沈氏进觐,一体赐宴”,这在当时可谓无比恩荣。雪芸遵旨来到慈禧面前,慈禧见她姿容娴雅,稳重端庄,对这位姑苏女子似有特殊的好感。过了几天之后,又亲书“福”、“寿”二字赐给雪芸夫妇。为表示对慈禧的感恩,雪芸将名字改为“寿”,她丈夫更名为余福,从此沈雪芸即正式名为“沈寿”。清政府农工商部大臣载振也向他们夫妇颁发了勋章,并决定设立“女子绣工科”,任命余觉为总理,沈寿为总教习,传授她的绣艺。

同年,清政府又委派沈寿夫妇到日本考察艺术教育。东瀛之行,使沈寿大开艺术视野,对她后期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她敏锐地发现了西洋画和摄影技术对明暗光线的处理特点,不似传统苏绣中的平板、呆滞。经过潜心钻研,便把西洋美术注重透视、光线明暗、色彩变化和仿真效果融合到中国刺绣艺术之中,从而把中国的刺绣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

1907年,女子绣工科在北京正式开学,下设国文、图画、刺绣三门专业课。沈寿对教学十分认真,常到皇家动物园观察鸟兽羽毛色彩,并把实地观察记录作为教材。她此时在人物绣像的技法上也有了创新,为绣像表现现实生活拓宽了道路。

意大利皇后称她为“世界第一美术家”

自满清政府因与八国联军于1901年7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着意向各国

列强讨好。为庆祝意大利皇后诞辰,慈禧命沈寿仿照意后相片绣一幅四尺大像。当时的意后被称为世界四大美人之一,在相片中,她披着细亮披肩,外罩白色纱衣,胸前悬挂勋章,错落起伏,颇难描绘。沈寿潜日刺绣半年而成,经慈禧过目后,很快被送到意大利。

意后雅好修饰,许多著名画家曾为她画像,都未能合意,而见到沈寿的作品后,爱不释手。为表谢意,她亲自致函慈禧,赞誉沈寿为“世界第一美术家”,并谓东方女子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可驾他国之上。意后还把她平日配用的钻石手饰、五色钻镶的宝星金表和20万意币酬赠沈寿,并在金表上贴上皇家徽号,以示格外珍重之意。沈寿为此像获得1910年召开的南洋创业会一等奖;1911年此像又在意大利都灵万国博览会上获得最高奖。

当这一消息传出后,各国报纸竞相登载,沈寿声誉远扬海外,邀请沈寿到各国游览的信函如雪片似飞来,沈寿当时无心游览世界风光,只想趁此机会学习别国艺术经验,博采众长,补己之短。于是她先赴日本观摩刺绣技术,然后到意大利参观都灵博览会,接着她又远涉重洋来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各国工艺美术家都想借此机会一睹这位“世界第一美术家”的风采,而沈寿则尽量避免应酬,专心致志地饱览各国工艺美术佳作,从中汲取精华。她在国外参观学习期间,在绣艺上受到很多启发,对她此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神绣《耶稣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清王朝的覆没,绣工科也停办了。1914年,当时任实业部长的张謇,十分重视沈寿的刺绣,特邀请沈寿夫妇到南通担任“女红传习所”所长。

沈寿在南通“女红传习所”主持教学之余,一直身不离绣棚,艺术创作无一日稍懈,在她不惑之年又创造了一种“旋转”针法。她依据一张著名的西洋油画《耶稣》的摄影件,由她的丈夫余福摹入绣片。沈寿采用100多种颜色的绣线根据摄影件的光色差异,巧用色线,突破过去单向排列丝路的传统绣法,进行灵活多变的仿真绣法,按人物面部受光的明暗层次与肌肤纹路的阴阳运色,循画理

而显真形,因而使画面立体感更强,达到形神兼备之美效。她在刺绣这幅画像时,还创造性地将好几种不同色彩的丝线穿在一根针上,用“滚针”绣法,惟妙惟肖地绣出耶稣受难时的荆棘冠下的血渍,表现耶稣临危不惧、普救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这幅《耶稣像》,是她将东、西方艺术有机融合为一,在世界艺术史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也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目前在中国南京博物院珍藏的《耶稣像》,高54.8厘米,宽39.4厘米,是近代“绣圣”沈寿的一幅代表作,被世人誉为“神绣”,它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曾荣获“卓绝大奖”。

1919年,沈寿在患病期间,又以惊人的毅力,历时3年绣成最后的杰作《美国女优倍克像》。《美国女优倍克像》是根据当时美国著名影星倍克的肖像刺绣的。这幅画绣中的倍克是一位身着盛装的妙龄女郎,神态端庄、自然而生动。那缕卷曲的秀发,明亮的双眸,甜蜜的微笑,雾一般的白色纱裙和丰润的肌肤,都被绣得细致入微,层次分明,极尽华丽、娇艳之美。

据说沈寿的针法共有18种之多,其独创的旋针、散针,尤为世人称道,上述这两幅画也大量运用这两种针法。仔细观察绣像上的倍克,发肤纹路细致逼真,人物面部皮肤隐隐如水纹旋转,发丝富弹力感,似乎触手就能颤动。远观则人物跃然其中,眼光流闪,语言欲出,神韵之生动,则无以名状。

当倍克这幅绣像在美国纽约陈列展览时,倍克特前往参观。当她看到自己的形象被中国刺绣大师沈寿表现得如此生动毕肖,兴奋地欢呼起来,当即愿出重金购买。但当时我国著名实业家张謇正率领中国实业代表团访美,则以此乃国宝,无价也”而婉言谢绝。

1921年,对我国刺绣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沈寿在弥留之际,将《耶稣像》和《美国女优倍克像》赠送给张謇,张謇将它珍藏在南通博物苑中。抗战爆发后,这两幅绣品一度存放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此后去向一直不明。多年来,经过张謇海外亲属们多方查找。终于在1973年由在香港的张謇之孙张融武寻觅到它的下落。1987年10月,这两幅举世奇珍价值连城的名绣,由张謇先生

孙媳妇蒋蓉卿女士代表张氏家族把它带回南京，捐献给江苏南京博物馆，此举受到政府的嘉奖。

开刺绣教育之先河，留下珍贵遗产《雪宦绣谱》

沈寿在出访各国考察艺术期间，亲眼看到中国绣品在欧美大受欢迎，于是萌生了出口绣品的念头，认为这样既可传播中国工艺美术，又可赚取外汇。在她回国不久，便向清政府建议创办一个绣工传习所，亲自主持，广招学员。辛亥革命爆发后，此议化为泡影。沈寿为自己的心愿不能实现一直感叹不已，后偕丈夫余福去天津，在那儿自设刺绣传习所，授徒课艺，这是中国第一所刺绣教育机构，尽管经费筹措十分艰难，所址也不理想，但沈寿还是竭尽全力把传习所办了一个短时期才返回故里苏州。

上世纪中国著名实业家张謇，对刺绣艺术的热爱与扶植，也是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史上足以长期流传的佳话。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校时，因在清政府任职时即仰慕沈寿绣艺，便在南通女子师范设立绣工科，聘请沈寿为主任，沈寿欣然允诺，便于1914年合家迁往南通。沈寿辛勤擘划，亲自督教，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南通地区妇女入学者甚多，笔者母亲青年时代就是沈寿大师艺徒之一。沈寿除了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在工艺美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也有新的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母女相传和师徒传习的陈规教法。由于她有南通女子师范作为依托，加上沈寿在南北各地进行教学的亲身体会，并参照赴日访问时考察日本工艺美术教育的先进范例，为南通女红传习所制订了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沈寿在南通女红传习所执教8年，先后培养了十五期近150名学生，许多弟子后来成为绣艺名家，如全静芬、巫秀莲等人。

沈寿的刺绣精品，创作题材丰富多元，举凡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无不搜罗殆尽。她的早期作品以佛像祝寿为主，后期人物肖像更是精湛突出。以五代、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的千古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名画为例，沈寿的刺绣手卷，长宽各为6.2米、0.4米，这幅作品不仅是沈寿精美绝伦的“神来之笔”，也是名画与名绣的珠联璧合之作。

1998年2月，在中国台北佛光缘美术馆展出了艺术大师沈寿百幅杰作。它包括：代表多子多孙、多福多寿的“石榴”、张大千的“莲花观音”、梅兰芳的“净瓶观音”、郑板桥的“兰竹”等，在众多宫廷艺术品中，“沈绣”作品都被列为上乘，受到非常严格的保护。目前也只有北京的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苏绣的故乡苏州、南通等地，才有机缘偶尔得以一窥“沈绣”真迹。

刺绣是中国的一项古老的艺术。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就用灵巧的双手把刺绣艺术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到了近代，涌现出苏绣、湘绣、顾绣、鲁绣等著名流派，可谓群芳斗艳，万紫千红。沈寿继承了苏绣的传统技艺，但又不为成法所囿，刻意求新。如她在刺绣《耶稣像》中耶稣的眼睛时，运用了稀、细、短、转好几种独特手法，巧妙地运用了底料的白色，留空不绣，作为眼白。这样既表现了眼球的空灵而传神，又使眼睛略次于鼻梁的高度，使面部层次更为分明，形象也更为生动逼真。又如在绣《美国女优倍克像》时，表现了她在用针上的功力是无与伦比的。在女优的面部，每一针的落点都是深藏在一丝中间，而千丝万线无一丝针迹。为使人物的口角、眼角、发际之间等细部都显其神，她常在阴阳浓淡之间，加绣一两针极细的短针，美人的笑靥和神采顿时显露出来，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充分反映出这位刺绣名家高度的造型才能和美术修养。

可惜这位刺绣名家只活到47岁就夭折了。由于晚年夫妻生活不谐，她终年累月自锢于绣房中，忧郁寡欢，虚弱多病，不幸于1921年5月13日去世。

为把沈派艺术留给后人，张謇担心沈寿死后绣艺绝世，便恳请沈寿把自己的绣艺著书流传，这也正合她的心愿，于是由沈寿在病中口授，张謇亲自笔录，整理出了一本《雪宦绣谱》留世至今。此书用文言文叙述，虽仅万言，但内容丰富，包揽了沈寿总结整理和创造的18种针法，图文并茂，是我国刺绣艺术宝库中一份极有价值的艺术遗产；张謇先生亦为此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沈寿死后，张謇根据其遗言，为之公葬于南通市郊黄泥山南麓，墓碑书曰：“美术家江苏吴县沈寿女士之墓”。

（责任编辑 方 徨）

李世民与“贞观之治”

● 江仁宝

李世民即唐太宗。公元599年1月23日诞生于一个李姓贵族家庭里。他十六岁就应募从军,十八岁随父起事,后来带领唐军东征西讨,统一全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被立为太子,继帝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元年。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间,吸取隋亡的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民族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逐渐趋于安定,国力不断加强,从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贞观之治”的繁荣兴旺局面。为后来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对后世、对世界都产生过比较深远的影响。这无疑是同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相一致的,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么,“贞观之治”涵盖些什么内容呢?据各种史料记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

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珪、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勣、秦叔宝、程知节

等 ;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 ,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 ;此外 ,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 ,不分亲疏 ,不避仇嫌 ,不论前后 ,任人唯贤 ,只要确有才能 ,忠诚于唐 ,都能委以重任。为了选拔人才 ,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 ,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 ,以网罗人才 ,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 ,李世民“尝私幸端门 ,见新进士缀进而出 ,喜曰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 :太宗皇帝真长策 ,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 ,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 ,能够扬长避短 ,使其各得其所 ,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 ,必曰 :‘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 ,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 193 ,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 ,共掌朝政 ,发挥个人的长处 ,集中大家的智慧 ,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 ,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 :“朕思天下事 ,丙夜不安枕 ,永惟治人之本 ,莫重刺史 ,故录姓名于屏风 ,卧兴对之 ,得才否状 ,辄疏之下方 ,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 ,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 ,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 :“古人云 ,王者须为官择人 ,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 ,则为天下所观 ,出一言 ,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 ,为善者皆劝 ,误用恶人 ,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 ,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 ,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 ,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第三、“开直言之路” ,兼听纳谏。李世民深知 ,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 ,没有忠臣贤吏辅佐 ,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 ,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的意见 ,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 ,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 :“人欲自照 ,必须明镜 ;主欲知过 ,必藉忠臣。主若自贤 ,臣不匡正 ,欲不危败 ,岂可得乎 ?”“人君必须忠臣辅弼 ,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 ,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

说过 :“朕每思之 ,若欲君臣长久 ,国无危败 ,君有违失 ,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 ,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 ,寄于卿辈 ,即义均一体 ,宜协力同心 ,事有不妥 ,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 ,不能各尽肝膈 ,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 ,裨益政教 ,终不以犯颜忤旨 ,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 ,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 ,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 ,小事不论 ,大事又将不可救 ,社稷倾危 ,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在他的倡导下 ,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如魏征谏止封禅 ,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 ,戴胄谏设义仓 ,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 ,均被采纳。在纳贤和纳谏方面 ,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 ,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召见魏征 ,责问他 :“汝何为离间我兄弟 ?”魏征面无惧色 ,举止自若 ,回答说 :“先太子早从征言 ,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 ,却“改容礼之 ,引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 191 ,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 :“魏征往者实我所仇 ,但其尽心所事 ,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 ,何惭古烈 ?征每犯颜切谏 ,不许我为非 ,我所以重之也。”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 :“人言陛下欲幸南山 ,外皆严装已毕 ,而竟不行 ,何也 ?”唐太宗笑而答道 :“初实有此心 ,畏卿嗔 ,故中辍耳。”又有一次 ,李世民“得佳鹞 ,自臂之 ,望见征来 ,匿怀中 ;征奏事固久不已 ,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 193 ,贞观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 ,一次罢朝回宫 ,怒气冲冲地说 :“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要杀谁 ?李世民说 ,杀魏征 !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 ,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 ,长孙皇后说 :“妾闻主明臣直 ;今魏征直 ,由陛下之明故也 ,妾敢不贺 !”这一番恭维话 ,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 194 ,贞观六年三月)总之 ,李世民“自比于金” ,而以魏征“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 ,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 ,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 ,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 ,李世民说 :“贞观以前 ,从我平定天下 ,周旋艰险 ,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

后,尽心于我,献纳忠悛,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当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殁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贞观政要·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开初曾“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惧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以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总之,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是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贞观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杀”的法制思想分不开。他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单靠严刑峻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对于执法官吏

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李世民对侍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小事,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不应等闲视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滥”。所以,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开选举”,他下令“诈伪阶资”者自首,否则处死。后查出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李世民认为,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并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有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在赋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当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李世民,只是记述“贞观之治”可资后世借鉴者。(责任编辑 致 中)



依附心态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七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大如杜甫、李白，也未能免俗。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从制度设计上，就只给读书人留下了这“华山一条路”。

另一则见《能改斋漫录》《艺苑雌黄》、《词林纪事》、《词苑丛谈》等也有传述。说的是填词名家柳永（原名柳三变），因为一阕《鹤冲天》有“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及“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等句，被宋仁宗看到了，于是记在心里。到科考时，特意将他黜落，还说了“且去填词”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之类的话，于是柳永一生功名蹭蹬。虽然后来改了名字及了第，也只当了一个小官，死的时候连葬资也没有。比起孟浩然来，柳永似乎想改变一下读书人的宿命。他选择了另外一条生活道路，把填词作为自己的生涯，整天同歌伎们混在一起，为她们写歌词，还打着“奉旨填词”的牌子。他的词在当时很受欢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足见流传之广。但是，社会制度的设计，并没有给读书人留下其他出路。柳永的填词生涯虽然为下层民众欢迎，却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当大官的晏殊斥他格调不高，其实，晏殊那些“太平无事荷君恩”；“人尽祝、富贵又长年”的词句，同样媚俗，格调只怕还不如柳永的“针线慵拈伴伊坐”。然而晏殊一生富贵，柳永却落拓而终。他跳不出那座五行山”。

“五四”以后，读书人的生活道路有了更多的选择，但社会的制度设计，依然强化着读书人的依附心态。所谓皮存毛附之说，便是依附关系的新表达。依附心态不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很难养成。而没有这种精神与思想，读书人就永远不能成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也终难有长足的进步。诗曰：

得失龙头一望中，或衣青紫或秋虫。

进身全仰提携力，自由精神牛马风。

有两则很有名的故事。故事所述之事，或系附会，故事所体现的读书人心态，却是实有。

一则见《唐摭言》、《北梦琐言》、《唐诗纪事》等多种笔记。大意是说孟浩然诗做得很好，但一直没有当上官。有一次，王维（有说是李白，有说是张说）待诏金銮殿，约他一起谈论诗文，恰巧玄宗驾临，孟浩然吓得躲到了椅榻下面。王维不敢隐匿，只好如实禀报。玄宗闻知很高兴，诏见诗人并要看他的诗作。于是孟浩然念了新作一首：“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才念了四句，玄宗就不高兴了，说：“我又不曾弃你，是你自己不求仕进嘛。怎么反倒作出这样的诗来！”于是，孟浩然被放归南山，从此没得官做。读孟浩然诗，始终不解的情结，就是自以为一肚子学问，却未能得到皇上的赏识。

中国的读书人（那时没有也不可能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总体而言，读书的目的就是效忠皇室，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依附于皇家，一日无君则惶惶然。离开了皇家，就没有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生活。孟浩然的放归南山，未必是因为玄宗发了脾气。但从他的心态来看，那种抑郁，那种颓唐，无疑是因为无缘攀附皇室。这是读书人的普遍心态，即便伟

欢迎继续订阅

《炎黄春秋》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爱国大团结为办刊宗旨。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溢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老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的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2004年以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下半年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68532569

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胡耀邦与谭启龙的交往**
- **重新评价张闻天莫斯科留学**
- **西路军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 **刺绣艺术家沈寿**
- **蒋斌将军蒙难记**
- **杨子荣的真人真事**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

炎黄春秋

2004/8(总第149期)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常务副社长:徐孔

执行主编:李晨 徐庆全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渊

秘书长: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长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真(010)68532569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